

# 自序

兒時愛談革命，曾經過眼之革命書報，頗不在少，而印象最深者則爲鄒容所著之壹本「革命軍」，太平洋客所著之一本「新廣東」。太平洋客原出康門，非純粹的革命黨，但在新廣東裏頭，則充滿革命思想。當時新廣東頗爲風行，因此後來遂產出了壹本「新湖南」，我所看過的，祇是壹冊很簡陋的小字木刻本，著者楊篤生先生，是有名的民族革命家，後來即因感激風潮，在英倫蹈海死。而今事隔三十年，新廣東所講的甚麼話，經已完全忘却，祇憶得其中之一句，在書中時時反覆引述：「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言非滿洲人之廣東也）。其時初去豚尾（剪辮），意氣自豪，回首當年，恍彷彿還是昨日的事。

我對於廣東，向來茫然，所謂鄉土觀念者，在我可算得是薄弱到極，從前流浪在外，總不思家，然自故鄉淪陷，欲歸不得，鄉土之念，即悠然而生，這不僅我一個人爲然，詢之他省友人，都莫不如是，蓋自有史以來，鄉土之切，從未有如今日者也。因爲鄉恩切，故對於鄉土之事，特別關心，從而憶起三十年前所讀過那本新廣東，與兒時那種蓬勃的熱烈的革命的情懷，不知不覺間，遂寫出了這本「嶺南文化」。

此書雖然祇得幾萬字，但其中論據，已經過兩年期間之往復斟酌，寫好了承廣東省文化運動委員會之邀請，到韶州作公開演講，講畢以此稿付印，壹切演講印刷之事，承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黃麟書先生，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院長崔載陽先生（均該會委員），文化運動會秘書黃炯第先生，賜以助力，玉成其事，故述其梗概於此，並表謝忱。

民國三十年九月

尊生自序於曲江客次

#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黃尊生著

## 目錄

- 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一)
- 第二章 明亡與嶺南之關係……………(一三)
- 第三章 嶺南學術之本色……………(二三)
- 第四章 近百年來嶺南文化之特徵……………(三九)
- 第五章 嶺南文化之暗流……………(五五)
- 第六章 嶺南文化之前瞻……………(六九)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 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

嶺南本爲越南國（越亦作粵），其地包括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儋耳各郡，而今則差不多專指廣東而言，其開國始祖爲南越王趙佗（故廣州有佗城之名），這是一個倔強到極的「蠻夷大長」。趙佗如是，趙佗的子孫亦然，所以從前的史書與地方志，每逢講到南粵人民，都說他慍悍難馴，或者說他不沐教化，男人固無論矣，即在女人，亦有一種剛強之氣，如隋唐之際的譙夫人，卽其一例。嶺南民族所以含有一種特性，大約是由於他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環境所造成，拿地理環境來說，嶺南北負五嶺，東南完全瀕海，在全國各省中，其海岸綫最長。濱海之地，日與洪濤巨浪接觸，觀濤瀾之洶湧，汪洋之無際，其所感受，自然與內陸人民祇與江河湖沼接觸者不同。在昔南海出產奇珍，居民以採獲珍珠珊瑚玳瑁，捕捉犀象鼈鼉爲業，這是一種冒險的生活，非膏腴腹地耕稼者所能爲，而徐聞合浦等地，自古以來卽與交趾爲中國對外之交通孔道，居民因生活之需要，又習於航海，浮家泛宅，有時且遠涉重洋，這又是一種冒險的事業，而因航海，復與波斯大食諸胡賈及其海舶發生接觸關係，而多多少少受其影響，如是，其人民之性質便又與中原人士有多少之不同。至於氣候，潮陽廣州蒼梧一帶，皆爲北回歸線所經，嶺南全境，有一半屬於熱帶。其地溫濕多雨，自

昔被人視爲蠻烟瘴雨之區，春霖淫雨滂沱，毒霧迷漫，夏秋暑熱，炎氣薰蒸，從前謫宦，無不視此爲畏途，韓愈居潮州，上表言潮地颶風鱷魚，禍患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劉禹錫貶連州刺史，言一入嶺南，卽染瘴瘧。白居易送客遊嶺南詩，有云：蒼鬱三光晦，溫暾四氣勻，瘴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爲老，蠻陬不易馴，……；路盡羈棲客，宦多謫逐臣。……；蘇轍穎濱集言，雷州蠻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入有陽淫陰伏之病。東坡居海南，亦云：儋州食無肉，出無友，居無屋，病無醫，冬無炭，夏無泉，齶雖不多，口無風土之大概。至於英德府，因爲烟瘴特甚，在宋一代卽有人間地獄之號，凡流竄至此，或牢獄於此，多不能免，可見嶺南氣候之可畏。而粵人因爲生於斯，長於斯，對此蠻烟瘴雨炎毒霧，獨能抵抗，代代生存，而抵抗力隨之而愈強，不爲天然所淘汰，所以在遺傳上又形成一種體質與一種特性，這是嶺南民性由地理環境所造成之一個特點。至於歷史環境，則嶺南民性由此陶鑄而成者更深，而今試伸述之如下。

嶺南雖然僻處海隅，然中原每逢有事，嶺南莫不受其影響。從趙佗起，漢以後中原人民不斷的移來嶺南；與當地人民雜居，故嶺南人民，在血統上，很早卽已經接上了中原的系譜，一方面使嶺南人民在血統上受到中原的遺傳，又一方面則使中原人民，來到嶺南，受到風土氣候之影響，而變化其氣質。晉末五胡之亂，中原人士，避地南來者更多，黃瑜雙槐歲抄

云：自漢永安至於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南，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深，故習漸變，庶幾中州。蘇軾瓊州伏波廟記云：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者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此皆可爲例証，然中國歷史對嶺南影響最深最巨者則實爲宋亡與明亡這兩件事。宋亡，陸秀夫張世傑等擁宋帝渡海南奔，演出崖山之一幕悲劇，這是人人知道的，不過這件事對嶺南之影響究竟如何，則尙有加以說明之必要。亡國，本身就是一齣悲劇，對歷史上之民族，影響最深，銅駝荆棘，禾黍離離，千古傷心之事，無過於此，而南宋之一齣悲劇，爲此一幕，則完全以南粵爲舞台，以此舞台，演此悲劇，登場唱演，固然是悽楚萬分，即在……一觀，亦掩泣低徊，不知涕淚之何從矣。故南粵人民，自宋亡以後，卽淪而爲遺民，深察此一層亡國之痛，由此而加強其民族意識，使其成爲日後反抗異族之一枝勁脈，其間關係，很有因果，而今我們再看，這個舞台，演出這齣悲劇，其間花了多少時間，要用到幾大的場面。

宋統之崩，據從前史書所載，爲德祐丙子二年，卽公元一二七六年，（元紀爲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杭州），陳宜中等奉益王昀卽位於福州，改元景炎，分道出兵拒敵。十一月，元兵至建寧，其勢甚急，乃捨福州，入海至潮州，由此轉徙流離，迄無寧所，時胡元分道將兵入閩廣，一以舟師出浙江之明州，一以騎兵出江西，入梅嶺，帝

遂浮海出淺灣，經甲子門，至廣州，景炎二年九月，復還潮州之淺灣，十一月，元兵來襲，張世傑奉帝倉皇走秀山（東莞）至於井澳（番禺東莞間）適風濤大作，舟船俱壞，溺水幾至不救，未幾元兵來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香山海口）復入海，至七星洋，欲往占城（暹羅）未就，張世傑乃奉帝駕幸香山，未幾復還駐淺灣。景炎三年正月，帝在謝女峽，三月駐礪州（在吳川縣南）遣兵略取雷州。前後二年餘，烟水迷茫，往來飄泊，凡潮州、惠來、海陵、二豐、惠州、東莞、番禺、香山、新會、陽江、電白、吳川、雷州、甲子門、大嶼山、伶仃洋、七星洋、厓門、海陵山，沿海沿岸，無不有宋室君臣之足跡。景炎三年四月，帝崩於礪州，陸秀夫張世傑乃共立王弟衛王昀爲主，以陸秀夫爲左丞相，五月，帝昀卽位於礪州，改元祥興，六月，遷於新會之厓山，時宋軍所泊，居雷化二州之犬牙交錯處，而厓山在巨海之中，與山巖相對，儼如兩扉，潮汐出入，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守以自固，乃奉帝昀移駐於此。衛王復立，閩廣各地紛起響應，胡元恐其聲勢坐大，乃以賊將張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水陸大發，分道西南，祥興二年己卯，張世傑與張宏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蹈海死，世傑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至今電白海陵山有丞相嶺）。宋室統緒至此完全斬絕，而厓山之一幕悲劇，亦至此告終。

幼主蹈海死（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前後兩年餘，時間雖然不算長，但沿着廣東海面這一帶地方，往返飄流，水陸數千里，足跡所經，在空間而言，則不能不說很廣，足跡既廣，其所遺留之痕跡，及其對於這一帶地方所發生之影響，便自然很大。南海風濤，向來險惡，宋室君臣的舟楫，大概都是沿着岸邊而行，所以香港九龍有宋王台，一般人都認為是當時宋帝昺之遺跡（照理應爲宋帝昺而非宋帝昺），其實宋帝遺跡，應不止此，其他東莞香山新會各地，均應所在都有，不過後人未曾發現耳。其時參加此一齣悲劇之主角，除張世傑陸秀夫之外，最著名者爲文天祥。天祥本出鎮江西，景炎二年，由江西入粵取梅州，與張世傑桴鼓相應，以後一年餘，來往江西廣東各地，曾略取循州（惠州）潮州，屯兵麗江浦，入船澳（歸善縣南）開府於惠潮二郡。衛王昺立，加天祥爲少保信國公，屯兵潮陽，後來與元兵戰，兵敗走五坡嶺，被執，押送厓山，復由此再押至燕市就戮，其正氣歌有「傳車送窮北」之句，卽指此。其過伶仃洋賦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爲千古傳誦。又其登越王台賦詩，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台，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烟橫古道行人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銜盃，亦傳誦嶺表。

因爲宋室君臣這樣的艱難困苦，悲壯義烈，以支持這個殘山剩水的局面，欲保持半壁江山於東南之一角，遂激起南粵人民不少的義慨，其中最有名的是東莞榴花村的熊飛。景炎元

年，元兵入廣州，熊飛起兵勤王，舉義兵，曾一度與宋兵克復廣州，其後元兵度梅嶺，飛與曾逢龍禦之於南雄，逢龍戰死，飛退保韶州，元大兵圍之，飛晝夜督兵，且守且戰，後守將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所居銅嶺，去城十里，有塔曰榴花塔，相傳飛起兵時，與元兵大戰處，每逢陰雨，猶聞金鼓之聲云。

其次爲香山馬南寶，南寶饒資財，讀書好義，景炎二年，帝昺自潮州之灣灣航海避敵，過香山境，南寶獻粟千石以餉軍，其後張世傑奉帝至香山，以南寶之宅爲行宮，帝崩，使者奉帝遺殯於南寶家，南寶乃募人爲疑塚於壽星塘五處，其實永福陵乃在厓山也。宋亡，南寶逃匿不出，嘗作詩寄慨。後被執，不屈死。相傳端宗（帝昺）臨幸香山時，丹荔方熟，嘗摘一枝，其後經摘處，風味獨殊，人以爲異云。

其次爲伍隆起，新會人，三世事宋，帝昺舟次厓山，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爲義兵以抗敵，張宏範入廣州，隆起力戰，累日不沮，後爲其部下謝某所殺，以其首級降元，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用木刻頭葬於文逕山口（新會城東南八里）。後秀夫募得謝某，戮之以祭隆起之墓，故後人猶名其墓爲釘頭墳，名其村爲釘頭村云。

除此之外，義烈忠勇之士，所在多有，卽在厓山之役以後，猶未止息。因爲這一幕悲劇感人太深，所以終忽必烈之世（在位卅五年），嶺南禍亂相乘，前仆後繼，屢屢不已，如至

元十七年有廣西廉州之亂，十八年有南海李梓之亂，二十年廿一年有南海歐南喜新會黎德之亂，南喜聚衆十萬，黎德聚衆二十萬，舟船七千艘，經年而後能平。廿二年有潮惠二州之亂，廿四年有肇慶之亂，廿五年廿六年有梅州惠州之亂，以董賢鍾明亮爲首，吉安、贛州、南安、韶州、南雄、汀洲、漳州等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廿七年有江西樂昌之亂，廿八年有廣東各地之亂，廿九年有南雄之亂，卅一年有欽州各處之亂。成宗（鉄木耳）繼位，在位十三年，廣東各地，連年水旱饑荒，由此至順帝至正十二年，廣東饑荒益甚，饑旱之外，加之各種天災，颶風、地震、山崩、星隕、火災、海溢、瘟疫、河水氾濫、霖雨成災、一切天災，應有盡有，此往彼來，連綿不絕，因是，各地亂事又起，至正十三年有南海悅城德慶各地之亂，十五年有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十六年有熊天瑞之亂，攻陷南雄韶州；其時陳友諒已倡義於江西，各地已紛紛欲動，而廣東各地，災象未已，至正廿一年，增城新會香山豪傑紛起，攻陷縣城，廿二年南海縣民邵宗愚（於廿三年起義），攻入廣州，殺元將八撒刺不花，廿五年明將常遇春克贛州，熊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於明，廿八年二月，潮州降於明，三月，明兵取惠州路，四月取英德路，取廣州路，七月海南海北諸郡皆降於明，元統至此遂告絕，雖不能算得一齣悲劇，但亦未嘗不可以視爲一齣惡劇，或者諧劇。

綜觀這九十年的元統，在嶺南一幅地方，大約可以分爲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爲宋帝

自臨安出走以至厓山之役，其間祇不過三年，第二個階段為自厓山之役起，以終於忽必烈之世，約為三十二年，各方起事。擾攘不已，可視為厓山一役之尾聲。第三個階段，自鐵木耳起，以至於順帝至正十二年，約為三十年，各地水旱饑荒，人民憔悴呻吟，無力再起，是為潛伏時期。第四個階段，自至正十二年以至於元亡，約為廿五年，四方豪傑再起，是為推倒異族·復興漢族之前奏。這九十年間，除了中間三十年水旱饑荒，人民憔悴呻吟，無力再起之外，胡元對於嶺南，實未能加以如何之統治，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南粵民性之「慄悍難馴」，又一方面，則實因宋亡之最後一幕悲劇，係在嶺南演出，以南粵為獨一無二之舞台，其關係至深且巨也。

此種關係，我們可以見得到的，第一是使南粵人民不特能夠親眼看見，而且能夠躬親參與此種亡國悲劇之演奏。在歷史上永遠留一段傷心紀念，以供後人之憑弔，而激起其民族之思想。第二，這是中原對嶺南之第一最大規模之移民。（晉末·胡擾攘，中原諸郡，亦曾移民南來，然永嘉之亂，南渡者多集中於江左，所謂衣冠江左，即是以長江下游為其集中之大本營。間有一小部份，不辭勞瘁，然後間關踰嶺，南來百粵。然南宋覆亡，則均踰嶺渡海而來，集中於×南，以此為其移入之大本營。故嶺南之於南宋，猶江左之於晉末，兩次移民來粵，以後一次為最重要，遠非前一次所能及，其規模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元兵南

下，人人倉皇出奔，其時奔逃之方向，都是朝南，或則渡海而南，或則踰嶺而南，大概都以嶺南爲托命之所，除了宋室君臣舉室播遷之外，還有其他大批大批的中原人士，所謂冠帶之倫，據通鑑輯覽所言，衛王南遷歷山，宋軍所泊，居雷化二州犬牙交錯處，時官兵兵尚有二十餘萬（其中大約有一部份爲粵人），多居於舟船，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及海外四州，可見其盛。他們來到嶺南之後，便流落在這個地方，從此世世代代，繁衍出許多子孫，同時與當地人民通婚，在嶺南民族的血統中，加入一些宋室苗裔與中原遺民的血液，使嶺南民族，在血統上起了一種變化，這是一種很重要的事實。我們試一查廣東各地的族譜，便很容易發現有許多是由當時播遷而來的。

南來之民，除了與當地人民通婚外，還帶來許多新文化（中原文化）。其時嶺南文化，不用說是比中原文化較爲落後，自然有一部份爲中原文化所征服，而中原文化，自是而後乃在嶺南植下一個基礎。這個基礎相當深厚，相當牢固，後來中原的文化，因時代與環境之關係，逐漸變遷，但在嶺南，則仍然保存其最初之面目，除衣冠禮俗外，最顯著者爲語言。而廣東語言，所以保全有一部份之中原古音，就是這個道理，比如「林」「南」之爲閉口音讀作[Lum, Nam]；「雁」「雅」「家」「幾」之作顎音而不作齒音，讀 $q$ 而不讀 $y$ ，讀剛音 $g$ 而不讀柔音 $g$ ，「甫」「微」之爲重唇音而非輕唇音，讀P M而不讀F V，至「睇」「覩」

二字。從前六朝文人最喜用之，唐以後即不多見，然在廣東，則流行於俗語，更應上溯到東晉移民的關係，或者三國兩漢的關係。

廣東人通常說他們的祖宗是從南雄珠璣巷來，即此便可見其江西之來路了。大約中原移民，有兩條來路，陸路由江西經梅嶺，或湖南經騎田嶺而來，水路則遵海而來，所以香山一縣，北部石岐一帶，有很多自言其祖籍原在江西湖南，南部恭谷二都，及西部之隆都，語音多近閩南，與石岐方音迥異，不問而知其始祖是由福建來的。郝志云，東晉南宋，衣冠望族，向南而趨，占籍各郡，於是言語不同。省會音柔而直，歌聲清婉可聽，惟東新各邑，平韻多作去聲，詔南連州，地連楚豫，曾語大略相通，其聲重以急，……由此可知嶺南民族，自宋亡後，有一部份變為南宋遺民的苗裔。新會有一條鄉，整族姓趙，相傳即宋室子孫。廣州鄉賢傳載有陳息卿者，其先汴梁人，欽宗靖康末，扈蹕於杭州，遂入嶺南，家於增城番禺之間。又厓山志載有陳元輔陳英輔，其祖自汴梁謫宦南雄，遷新會凌村。梁帝立，駐蹕厓山，兄弟獻粟數千石餉軍，特旨建義士坊於其里，輔等遣戒子孫，不得仕元。又有陳猷者，其先汴梁人，金人陷汴京，播遷南雄珠璣里，後移家新會下峒，景炎初曾助宋官軍與元人戰於南雄。未幾宋亡，乃辟穀，囑子孫毋仕元。又明初之伍宏道，其先亦為汴人，仕於宋，扈蹕南渡，至厓山，宋亡遂居新會。又李時行（字少偕，南園後五子之一）先世亦為汴人，仕宋

，南渡時，隸籍番禺，又宋史岳飛本傳載，飛死，岳雲棄市，收其家屬，徙之嶺南。由此可見南宋滅亡，因移民之關係，及厓山一役之關係，在血統上，在文化上，在思想上及民族意識上，對於嶺南之影響爲何如了。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 第二章 明亡與嶺南之關係

明祚覆亡，對於嶺南之刺激，其慘痛與深刻，實不減於宋末，其所以不同者，則南宋覆亡，最後所演出之一幕悲劇，完全由廣東包辦，而明亡之一劇，則分爲若干幕，每一幕都有他一個舞台，如弘光在金陵，隆武在八閩，至永曆與紹武，始在兩粵，又如滿人屠城，雖然廣州有兩王入粵之慘劇，然在江南，則亦有揚州之屠城，嘉定之屠城，江陰之屠城，使廣東對此，不能專利，這是比之前一代，稍爲要減色的，不過在全局而言，粵人亦曾出過相當的死力，在全套悲劇當中，仍不失爲一個主要的角色。袁崇煥之督師關外，人人都知，不過他不在嶺南，我們不必細說，如今我們要說者有幾個人，一個是陳子壯，一個是張家玉，一個是陳邦彥，這幾個都是忠勇義烈的大賢，其事蹟之悲壯，足與文天祥史可法後先映照，同垂不朽。查明亡之最後一幕，是崇禎殉國後，史可法等奉福王卽位金陵，改元弘光，金陵失陷，鄭芝龍等擁唐王聿鍵，立於福州，改元隆武，丁魁楚擁永明王（桂王）由榔立於肇慶，改元永曆，蘇觀生別擁唐王之弟聿錡立於廣州，改元紹武。福建廣州之局面，僅如曇花一現，不旋踵而亡，肇慶的局面亦並不長久，不過桂王流竄東西，所以永曆的命運，尙能延續若干年，最先由肇慶走廣西，走湖南，再由湖南還廣西，然後由此奔雲南，竄緬甸，因清兵（吳三

桂)之威迫，緬人執永曆投降，明統至此斬絕，至今在緬甸之民間故事中，尚有若干關於當時永曆之傳說，聆之使人悽愴不已。紹武的局面，雖然祇一刹那，然亦有很多令人感動的地方，這一幕戲的主要角色是蘇觀生(東莞人)，他最初由金陵走杭州，走福州，與鄭芝龍等擁立唐王，出江西經略贛州，唐王死後，回到廣州，倡兄終弟及之議，擁立唐王之弟聿錫。其時桂王已立於肇慶，廣州肇慶這兩個壁壘，乃成水火，互相攻伐，這是一種最不幸的事。清兵陷廣州，蘇觀生自縊死，後來聿錫亦投環而絕，與蘇觀生同葬在一個地方，在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即所謂紹武君臣塚是也。詩人羅天尺過其地，有詩云。流花橋北蔽蒿萊，孰向荒原酌酒杯，一死未慙俘緬日，九原休羨縉齊才，鍾山空有遺民恨，宮樹誰爲內監哀，不道白雲兵燹後，孤墳猶得傍朝臺。

而今我們再回到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幾位英烈身上。當時弘光即位金陵，曾起用陳子壯爲禮部尙書(子壯本爲萬曆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得罪魏闖，徙歸嶺南)，子壯本思戮力王事，以圖中興，無如馬士英阮大鍼諸人，朋比爲奸，均阻抑之使不能行。金陵失陷，子壯問關回嶺南，永明王(永曆)在肇慶即位，任子壯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督理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諸省軍務，與張家玉陳邦彥等先後起兵，子壯本來是南海人，遂從九江起義，與陳邦彥約同攻廣州，因爲預先洩漏消息，屢攻不下，退還九江，後來移師高明，高明城破，

被執押至廣州，不屈而死，死事極爲壯烈。子壯有一個弟子名黎遂球（註），守贛州，抵拒藩兵，前後幾個月，躬冒矢石，備極艱苦，贛州城陷，與敵兵巷戰而死。

（註）番禺人，字美周，工詩及古文辭，下筆奇警縱橫，數上公車，道經吳越，與吳梅村張溥陳際泰輩唱和，樹幟中原，稱絕代才子，生平好遊，自趙燕吳楚魯蜀以及滇黔，足跡無不至。

張家玉，東莞人，本來是崇禎進士，李自成陷京師，被執，後來逃歸金陵，南都失守，從唐王入福建，曾一度經略廣信，廣信失陷，回廣東，從東莞起兵，取新安，奉表於永明王，晉爲兵部尙書，攻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圍攻惠州，克歸善，屯兵於博羅。清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得萬餘人，家玉任俠好鑿劍，常與草澤英雄往還，故所至豪傑歸附，乃分其部衆爲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屢與清兵苦戰，後來清兵集步騎萬餘人，大舉來攻，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高崖深谿，據險自固，大戰十日，至力竭而敗，乃徧拜諸將，自投野塘而死。

陳邦彥，順德人，少以文章德行負重名，及門之士，每歲數百人，先後凡數千人，學者稱之爲巖野先生，陳子壯由金陵南歸，見其文而異之，延至其家，使諸生授業，邦彥亦重其人，爲執弟子禮。福王立，邦彥曾走南京，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能用，唐王讀而奇之。

，因蘇觀生之薦，監兵援贛州，後來唐王死於汀州，贛州旋亦失陷，遂還嶺南。當時嶺南之  
 一件最不幸的事，是廣州肇慶這兩個局面，互相對立，勢成水火，邦彥曾往來調停於其間，  
 但卒無效果，蘇觀生爲人虛浮驕恣，而永明王爲人亦懦弱，邦彥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清兵  
 入廣州，紹武傾覆，邦彥乃謀舉兵，其時有余龍者據甘竹灘爲盜，聚衆多至二萬人，其時清  
 兵於攻入廣州之後，連陷肇慶梧州，乘勝西上追桂王（時永明擬奔桂林），其勢極爲危急，邦  
 彥乃使余龍攻廣州，自己則從高明發兵，由海道入珠江，同時約張家玉曾師舉事，牽制清兵  
 ，以救桂林，清兵果然回師。未幾，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會師取順德，同時約陳子  
 壯於南海，張家玉於東莞，黃公輔於新會，互爲犄角，復聯絡南西一帶，陸路則恩平，陽春  
 ，新興，東安，水路則順德新會，各地議師，鼓行東下，大舉圖廣州，同時獲得內應，約期  
 於城中舉事，不意陳子壯之師，先兩日至，事機洩露，等到邦彥來時，陣勢已微亂，其  
 時余龍戰敗，應房被執，赴水死，余龍再戰於黃連，亦敗歿，子壯遂奔高明，邦彥奔三水，  
 入清遠。邦彥自起兵之日，每日祇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士卒同勞苦，故其軍最強，但因  
 爲分兵營救別軍，故精銳漸漸喪盡，外無援軍，城遂不能守。城破時，邦彥率數十人巷戰，  
 肩上受三刀，遂被執，以檻車送廣州，臨刑前賦詩，西向稽首受戮，死事極爲壯烈。

除邦彥本人外，其門下尙有一班弟子，隨之起義，邦彥之學，本爲嶺南所宗，前後受業

者凡數千人，一訓之以忠義，故當變亂時，從其趨兵者自馬廐房而下，有霍輝連楊景煜諸人，皆摧鋒陷陣以死。詩人梁藥亭（佩蘭）秋夜宿陳巖野先生故居，讀其遺集，感而賦詩，成五律六首，其詩云：

大節生平事，文章後不刊，墨痕猶似漬，碧血幾曾乾，自得乾坤正，誰知事勢難，草堂燈一點，霜氣逼人寒。

竟使神京陷，皇天亦不仁，衣冠生亂賊，草莽起孤臣，臥劍霜常動，揮鞭日欲新，弘光諸疏草，侃侃究天人。

妻子何曾惜，心肝祇爲君，戮行司馬法，百戰水犀軍，太白乘陰氣，招搖指敗雲，莫誰惟有歎，終古語難聞。

至今亡國淚，灑作粵江流，黑氣時聞哭，悲風不待秋，海填精衛恨，天墜杞人憂，一片厓山月，空來照白頭。

往日鳴珂里，孤兒應羽林，姓名麟閣重，骨肉主恩深，歎命嗟何惜，浮湘欲斷吟，及門諸弟子，同有伯夷心。

巫山不可問，中夜思空繁，私淑欽前輩，貧交得後昆，君臣千古分，忠孝一家言，危坐難終卷，秋風正掩門。

巖野忠義之氣。得此詩而益傳，由此詩亦可以窺見當時起義諸臣之苦節。屈翁山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彙輯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難諸臣，著爲傳記，其記永曆朝死事者，在嶺南有：前廣州殉難錄，後廣州殉難錄，南海起義臣傳，東莞起義臣傳，廣東起義諸臣傳，廣東死事三將軍傳，廣東死事四侯傳，潮州死事傳，封川死事傳等，都可以見當時死難諸人之忠勇義烈。其未死者則逃之深山窮谷，或削髮爲頭陀，藉此隱遯，以爲他日復興之計，故海幢華林諸寺，粵北丹霞山之別傳寺，及澳門望夏之觀音堂，曾一度爲末路英雄托身之地，如光鷲（跡刪），大汕（石濂），今回（更涉）今釋（澹歸）等之出家，都各有一段很悲痛之經過，（明末四公子之一之方密之，即在粵削髮，屈翁山亦曾一度爲僧），當時詩僧畫僧極多，所以明亡以後，嶺南所產出的一班詩人，都是民族詩人，如屈翁山，鄒湛若，陳元孝，王邦畿，吳猷，梁樾，伍瑞隆，趙燾夫，梁觀，薛始亨，彭睿壘，高儼，張穆，陶璜，王應華等，國變後，抱着一胸禾黍之痛，遂盡情以文書詩畫，孤行奇癖，以寄其亡國詩人之情懷，如鄒湛若，國亡後，抱着他所最愛的兩個古琴而死，所以王漁洋詠他的詩，有海雪詩人死抱琴之句。又如伍鐵山（瑞隆），於國亡後，逃入鳩艾山中，一去不返，後來他的墳墓，便祇有葬着他的衣冠，成爲一個衣冠塚。又如彭竹本（睿壘）國破後，隱居不仕，惟寄其踪跡於僧寮野屋，他是順德龍江人，自稱龍江村獠。其他如跡刪和尚，今回和尚等，更

難枚舉。

總之，明社覆亡，對於嶺南民族，有一番悲苦深刻的刺激，而由這番刺激，遂孕育出種種很強烈的民族精神，所以二百年來，廣東成爲洪門會黨（三點會）之大本營，終滿清之世，廣東會黨始終對於滿洲政府，成爲一個極嚴重之威脅。本來甲申變後，那種亡國慘痛，感覺最劇烈的是一班士大夫，不過後來滿洲政府出盡種種威迫利誘之手段，以籠絡士人，士人中了專制政治之流毒，爲科舉功名所引誘，爲學術文化之假面具所蒙蔽，漸漸忘其故我，不復再有亡國之痛，種族之感，於是那種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遂離開士人社會，而獨存於下層階級。

洪門會黨是一種秘密的組織，完全以種族革命，反清復明爲宗旨，凡宣誓入黨者必有種種之儀式，極爲莊嚴隆重，而每一種儀式，都必含有一點意義，如散髮披頭之表示恢復明裝（清裝則剃頭長辮，）如將一碗清水傾覆之表示反清，如以布纏眼，後來將布解開之表示復明，如紮草人紙人而以刀斬之以箭射之之表示復仇舉義，無一點不含有極強烈之民族意識與革命意識。此等秘密組織已遍於全國各地，而名稱最顯，旗幟最鮮明者則爲廣東，到後來且由廣東而傳佈於海外美洲南洋各地，故經過百餘年之醞釀，乃產出太平天國一幕驚天動地之事業。洪秀全由廣東而起義於金田，其討滿洲檄文的幾句：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

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至今讀起來，猶使人感奮。太平天國後來雖然傾覆，但三點會、秘密活動，在廣東依然繼續不停，所以後來孫中山先生亦得利用之以為其最初革命組織革命運動之一個基礎。洪門會黨不必說。明亡的產物，太平天國則為洪門會黨的產物，而後來之辛亥革命，則出於兩個淵源，一內在的，是洪門與太平天國，又一為外在的，是世界之革命潮流。所以辛亥革命成功，近因為孫中山先生之倡導革命，而遠因則為明社之覆亡。所以明社覆亡，實為直接孕育辛亥革命之遠祖，我們回顧當時，何以民族思想在廣東特別發達？何以會有乙未廣州之起事，庚子惠州之起事，壬寅廣州之起事，丁未黃岡之起事，惠州七女湖之起事，防城之起事，欽廉之起事，鎮南關之起事，庚戌廣州新軍之起事，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之起事？何以會有歷次之大暗殺？何以會有史堅如之炸德壽，劉思復之炸李準，溫生財之刺李琦，林冠慈陳敬岳之炸李準，與後來諸人之炸鳳山？終滿清二百六十餘年，廣東何以會成為革命的策源地，反抗異族的大本營？在過去的革命而言，廣東何以佔最多的編幅？而黃花崗的事蹟，何以獨出現於廣東而不出現於他處？而先烈長眠的芳塚，何以遍佈於廣州東郊？以至後來一二八淞滬的戰役，何以發難於十九路軍？與夫此次抗戰，廣東軍人無論在那一個戰場，何以都能夠「不辱命」，打得有聲有色，對得起本省，對得起國家？以至如香港澳門各地的小販，何以一旦發動義賣，幾日間便能夠造成一陣狂潮，不到一個月，從

他們的血汗所籌得之款，已超過一百萬元，從旁觀之，使人感極而泣？這其間，實在有一個原因，有一條線索，一脈相傳，由來已久，祇要我們認清楚我們的祖先有一部份是南宋的遺民，嶺南曾經以其地方，奉獻於歷史，作為舞台，以供厓山一劇之演出，其後明亡，這一塊地方，又經過一翻悲痛的洗濯，而嶺南本為海國，嶺南民族為濱海野民，最富於冒險進取心，最富於反抗性，我們祇要留心一下這些情形，便很容易了解出這個地理。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 第三章 嶺南學術之本色

而今讓我們談談嶺南學術文化

學術文化爲歷史與環境之一種產物，不是憑空而來的。嶺南在漢以後還是一片烟瘴之地，爲蠻夷之居所，爲謫戍之所適，而珠厓一地，且爲儒生之所請棄，故其間絕無甚麼學術文化之可言。中國學術文化，本來起於黃河流域，周秦之際，已經發達到如花如錦，六朝而後，始漸漸南移於長江流域，至唐而後大盛，一切都與嶺南無關。故在宋元以前，嶺南實在沒有什麼學術文化之可言，雖然在唐時，我們已經有一個張曲江（九齡），宋時，我們還有崔清獻（與之），李忠簡（昉英），余安道（靖），都是一時的人傑，然這些人之於嶺南，猶沙漠之有泉水，之有嘉木，實在是一個例外。實在講，嶺南能夠有一些些的學術文化，都是由外面對來的，質言之，都是由中原傳入來的，這其間便與中原幾次的移民（兩晉南宋），有絕大的關係。這幾次的移民，在中原爲大不幸，而在嶺南文化則爲大幸，除了因爲異族侵凌，中原板蕩，而至大規模移民之外，其與嶺南學術文化有絕大關係者則爲歷代之謫宦。嶺南這一塊地方，天然是一個謫戍之所，他在古代之中國，與中世紀之中國，儼然就是歐洲十六世紀以後之南北美洲，自六朝以來，流竄嶺南之顯宦，真是種種色色，不知多少，隨便拿

幾個有名的來講，則有南朝謝靈運之流徙廣州，（後在廣州被戮）唐宋之間之貶欽州，李邕之貶欽州，韓愈之貶連州，貶潮州，劉禹錫之貶連州，牛僧孺之貶循州，李德裕之貶潮州，貶崖州，宋寇準之謫雷州，曾布（曾鞏弟）之謫廉州，鄭俠之徙英州，秦觀之徙雷州，姚鉞之貶連州，蘇軾之貶惠州，貶瓊州，蘇轍之貶雷州，李綱之徙雷州，張浚之徙連州，趙鼎之徙潮州，岳飛家屬之徙嶺南（宋史本傳，飛死，岳雲棄市，藉家貲徙嶺南），明高攀龍之謫揭陽，湯若士之貶徐聞，這些都不過是無量數謫宦中之幾個。這許多人流徙來嶺南，雖然時間之久暫不同，（其中暫者一來即去，久者如張浚，居連州二十年，趙鼎居潮州五年，李光弼忤秦檜，一再流謫，居瓊州八年），但無論如何，總會對地方發生多多少少之影響，如三國時之虞翻，因為得罪孫權，流徙來嶺南，雖然處於罪放之中，而講學不倦，門徒常至數百人，在嶺南十餘年，年七十而卒，後來之光孝寺，相傳即虞翻故宅。又如姚鉞，貶連州，嘗採唐代文章，編為文粹，好事者於縣中建樓，以貯其文稿，官屬多遺胥吏抄錄。又如鄭俠，以繪流民圖著名，貶英德，英人無論貧富貴賤，皆加以敬事，遣子弟從學，皆其一例。至於蘇東坡韓昌黎兩個人，在謫宦中與嶺南關係最深，其影響更不用說。

由移民與謫宦之兩重關係，我們很可以看出當時嶺南之所謂教化，完全起於一班羈人謫宦與孤臣遺老，而施被之於山陬海濱之野民，嶺南各書院各祠宇所奉祀的先賢，最普遍的有

幾個人，一是蘇東坡，韓昌黎，二是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從這一點，可見孤臣謫宦對於嶺南教化之影響。此種教化，我們無以名之，最好名之曰「遺民的教化」。所謂遺民的教化，即是羈人謫宦與孤臣遺老之一種精神產物，經過海濱野民接受之後，再產出來的一種學術，便自然而然而有一種異樣色彩。此種色彩，與理學的色彩最相近，故嶺南學術，經過一番遺民教化孕育之後，便結晶於理學。我們已經講過，嶺南在宋元以前，沒有什麼學術之可言，嶺南而能夠有一種學問，樹立起來，實在是始於明代，始於理學，而明代理學之柱石，在嶺南（其實不止嶺南而已），則為陳白沙與湛甘泉兩位巨子。

明代理學，最初承着程朱之舊，無甚創獲，幾位大儒，無非守着宋人的成說，規行矩步，恪守宋人的矩矱，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這種理學，不過是宋儒理學之遺緒耳，未能於宋儒理學之外，更有所建樹也。明代理學之真能夠樹立起來，第一個是陳白沙之功，第二個是王陽明之功。黃梨洲在其所著明儒學案裏頭說過：「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陽明）而始大」。又言：「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又言：「先生（白沙）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獨開門戶，超然不凡」，即此數語，可以見其在明代理學上之地位。

陳白沙，名獻章，新會白沙里人，最初就學於吳康齋（江西崇仁，故稱崇仁學派），其時

康齋爲有明之一代大儒，繼承着宋人的學問，所謂「一稟宋人成說」，以白沙這種天才，當然不能恪守師傅，一成不變，故其自述學問造詣之最精要處，完全是由自己摸索出來，而青出於藍。到後來另成一個白沙學派，但無論如何，康齋總是明代理學之先驅。因爲白沙出於其門，婁一齋亦出於其門，（康齋有三個最得意之弟子，一爲陳石齋，卽白沙，一爲胡敬齋，又一爲婁一齋），而王陽明卽出於婁一齋之門，故首梨洲比康齋爲大輅之樞輪，可見其關係之巨。據白沙自序其爲學之經過說：僕年廿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卽康齋）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膏，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浚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言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此是白沙自叙其爲學之所得。又張東所（白沙門人）述白沙爲學云，先生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投竿弄艇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

由此，可知白沙之學，是從一個靜字養出來，故其學主靜，其教人亦以靜，他在語錄中說過，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說，爲學而勞勞擾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又說，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晦翁（朱子）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然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人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因爲他主靜，故主自然自得，蒼梨淵說，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來古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會點，近之則爲堯夫，可見其推專之至。至如何可以「自得」呢？一定要有覺悟。他說，人祇爭一個覺字，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但如何能夠覺悟？他很注重懷疑，故特別提出一個疑字，這是他膽識過人之處。他說，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又說，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他曾經對他的門人陳乘常講過幾句話，示以自得之學，他說，「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可見他不特自己很富於懷疑精神，而且以這種精神，灌輸於其門弟子。

白沙門弟子大概都能夠繼承師說，以虛靜自然爲宗，門弟子之中，最著名的是湛甘泉，

甘泉名若水，增城人，當時與王陽明齊名，旗鼓相當，彼此都是崇仁的再傳弟子，（甘泉學於白沙，陽明學於婁一齋，都是吳康齋的門人），甘泉與陽明本來很相善，後來講學，各立宗旨，甘泉門人，雖不及陽明之盛，然王湛兩家、互通聲氣，當時學於甘泉者，或卒業於陽明，學於陽明者，或卒業於甘泉，亦猶朱熹與陸象山之門下，互有出入，（語見明儒學案）陽明講學宗旨，爲致良知，甘泉講學宗旨，則爲隨處體認天理，王湛之學，各立門戶，由是甘泉門人，亦分爲二派，一派爲呂巾石等，是反對王學的，又一派爲唐一庵等，是調和王湛的，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當時王學聲勢極盛，除了南方的湛甘泉之外，北方尙有呂涇野一派，與之頡抗，成爲一種鼎峙三分之勢，甘泉的門人，絕不限於嶺南，從遊者殆遍天下（學案語），所以陽明的門人，亦由姚江而達於閩粵，粵中王門嫡派爲方獻夫與薛中離，而尤以中離爲最著，中離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以白沙從祀孔廟，他雖然不是甘泉的門人，但極尊崇白沙，因爲陽明與白沙之學，本來很相近，不知後來陽明從不提白沙，其故何在，甘泉對於白沙之學，真可謂鞠躬盡瘁，他享壽最高，一直活到九十五歲，一連做過南京吏部禮部兵部三部的尙書，精神又健旺，九十歲猶作南嶽之遊，生平足跡所到，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凡南京、揚州、貴池、衡山、羅浮、西樵、廣州、增城。到處都有他手建的書院，而其講學，則以西樵爲中心，所以嶺南的理學，十之八九是受白沙與甘泉之影響。

明代嶺南之學術，當然是以理學爲宗，而今姑且撇開理學，而談詩文，亦免不了受理學之影響。明初、嶺南之文風，起於南園之五子，所謂五子者，一個是孫蕢，一個是孫賁，一個是王佐，一個是王哲，一個是李德，一個是趙介，最初是由孫蕢與王佐發起，結詩社於廣州，城南之南園，開抗風軒，以延羅一時的名士，在這五子當中，第一個孫蕢（仲衍）便是一個理學家，承宋人之舊，三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著有理學訓蒙一卷，又著孝經集善一卷，由有名的理學家宋濂爲之作序。第二個李德（仲修）本來是一個經生，晚年亦以理學爲歸宿，潛心伊洛，可見在南園詩社裏頭，理學氣味之重。自孫蕢等於洪武年間結社南園，開粵中一代風雅，其後又有黎民表（惟敬），吳旦（蘭皋），李時行（少偕），梁有譽（公實），區大任（禎伯），重振詩壇於南園，稱爲南園後五子，與前五子遙遙相對，後先輝映。這後五子均同出於黃佐（泰泉）之門，而李時行則並出於湛甘泉之門。當時粵中理學，風氣極盛，湛王之學，分門立戶，各設書院，在珠江流域，傳白沙之學，由甘泉主之，在韓江流域，則倡陽明之學，由薛中離主之，而勞力以前一派爲最大。在此兩派之外，復有黃泰泉一派，泰泉之學，承宋人之舊，以程朱爲宗，惟對於理氣之說，獨特一論，教人以博約爲宗旨，其時明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泰泉與陽明討論知行合一之旨，幾次辯難，故與陽明不合，泰泉之學，在粵中理學，可稱爲別派，故在明儒學案裏頭，列入諸儒學案之中。

其時甘泉泰泉，講學東南，遠近從遊者極衆，李時行先後及門，而其他四子，則均出泰泉之門，可見南園後五子，其理學氣味，又比前五子爲重。實在講，自白沙甘泉而後，粵中文字，幾乎無一個不受過理學的洗禮，所謂理學，又自然大部份是白沙之學，此種影響，直至滿清中葉而未已。

明亡，嶺南學術，好像來了一個轉變，但其實祇是一時的表現不同，並不是完全離開理學，廣州城北之白雲山，有一個雲淙別墅，這是陳子壯所建的。當時子壯以禮部侍郎，抗疏南歸，特闢這個別墅，與名流區懷瑞，曾道唯，高賚明，黃聖年，黎邦彥，謝長文，蘇興裔，梁佑遠，陳子升，區懷年，黎遂球共十二人，吟詠其中，修復南園舊社，這是後五子之後，南園詩壇之瓊振。明亡，陳子壯與黎遂球死事最壯烈，所以後來嶺南的一班詩人都是民族詩人，如區露（湛若），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王邦畿（說作），吳猷（呈偉），梁樾（器甫），區瑞隆（鐵山），趙煒夫（裕子），梁觀（顯若），薛始亨（剛生），彭容瓊（竹本），高儼（望公），張穆（鐵橋），陶璜（甄夫），王應華（園長）等，我們都已經講過。屈翁山是嶺南最偉大的詩人，曾經一度削髮爲僧，國亡後，他的行動更爲奇特，忽儒忽釋，往來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攬涕而過。他性喜任俠，故其詩汪洋浩瀚，爲明以後國內詩人之一座寶塔，詩品遠在清初諸家之上，嶺南之有屈翁山，猶吳越之有黃

梨洲顧亭林，不過翁山是詩人，而顧黃則爲學者，此爲其彼此相異之點，至論其個人品格，翁山闍修獨行，其作風大約與王船山孫夏峯李二曲傅青主諸人，較爲相近。此外，遺有一陳元孝，他是陳邦彥之子，卽世人所盛稱的獨漉先生，巖野（邦彥）之學，本來爲嶺南所宗，前後受業者凡幾千人，影響於一代文風，至爲巨大，後來巖野盡忠，所以獨漉之詩，當然是滿紙家國之痛，其弔厓山之作，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兩句，至今猶爲人所傳誦。

由此，可見明亡以後，嶺南一班詩人，都是民族詩人。終滿清一代，嶺南雖然沒有興起過幾次很大的文字獄，如胡中藻，戴名世，曾靜，呂留良諸人之案，但民族精神之表現於文字上藝術上，是一可掩的，這又是遺民文化之一種表現，直接間接都與理學有關係。士大夫平時則談理學，國破則講復仇，理學在平時講默言動，天命理性，至國破之時則講舍生取義，慷慨復仇，這是一體之兩面，其一爲常態，又其一爲變態。

慷慨激昂，復仇流血，這種情緒，祇有在一個特別的環境裏頭，才能夠表現，等到日子久了，這個環境，已成過去，所謂俯仰之間，已成陳迹，這種情緒，復又歸於靜止。到那個時候，天命理性，存養省察，語默言動，那一類東西，又跑出來了。如是，嶺南在滿清一代，又繼承了明一代的理學系統，白沙甘泉，一脈相傳，延綿不斷。由明初以至於清中葉以

後五六百年間，嶺南文化，完全呼吸於理學氛圍之中，而所謂理學，又十之八九爲白沙之精神所支配。

至此，我們要講一講，在滿清一代，嶺南在學術上之位置怎麼樣？實在講，除了明成化以後至明亡之一個時期，又除了白沙甘泉兩個人之外，嶺南無論在什麼時候，在學術上都是沒有甚麼位置的，不過在滿清一代，更加顯出他的落後與貧瘠而已。查中原各地，自顧炎武胡渭閻若璣諸人之提倡，再加以惠棟戴震諸人之開創，百餘年間，學術彪炳一時，此真可稱爲中國學術之復興，經學、史學、天算、地理、音韻、訓詁、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突飛的進步，開闢了許多新天地，其間大儒之多，真是不勝枚舉，即使撇開經學不談，而言文章，其中古文家如桐城陽湖諸人，亦聲華赫赫，足與經學大師旗鼓相當，而返觀嶺南，則對此好像毫無關係，始終是處於學術圈外。這一二百年間，嶺南對於中國學術，簡直拿不出一個有貢獻的人出來，亦拿不出一種有貢獻的著作出來。一部古文辭類纂裏頭，簡直找不到一個廣東作者，又有人傳說，阮元初來廣東，想找一部說文解字，到處找都找不着，（這或者是一部段氏說文解字註，而不是許氏的說文解字）。廣東而能夠加入中國學術的隊伍，實自道光年間，阮元來粵，做兩廣總督，開學海堂，提倡樸學。爲之始。繼阮元之後，而再作第二步之努力者，則爲張之洞來廣東，開廣雅書院。

爲什麼嶺南文化會這樣的落後，這樣的貧乏呢？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地理的關係，因爲他僻處五嶺以外，南北隔絕，爲中原的文風所吹不到，這是有歷史以來，都是如此。其次，還有一個原因，恐怕也不在小，這就是理學的關係。而今讓我們再講一講理學，尤其是白沙的理學。

賈樸跋明儒學案云：孔孟之學，自秦漢以來，穿鑿支離，汨沒於訓詁章句之間，賴有大儒輩出，求之於心性之際，而証其所獨得者，在宋則有周程張朱五君子，在明則有康齋白沙姚江諸儒，冥搜靜悟，宗旨爛然，其間雖不無異同之見，而其求至於聖道，則壹也。這幾句說話，已經很可以講明理學的宗旨。理學家所注意的是心性，欲由心性之學，以進於聖賢，而其方法，則爲冥搜靜悟，以「觀大人之微，究高賢之蘊」，「還以握造化之樞機」（白沙學案語），至於訓詁章句，這是理學家所鄙棄，認爲穿鑿支離，不足學的。故白沙弟子林緝熙說，所謂問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卽塞而未通也）。這是他以道（心性）爲重，以學書爲輕之壹種說法。此外，陳時周（亦壹白沙弟子）亦說過，儒者有向上功夫，詩文其土苴耳。至於李大厓（甘泉而外，白沙之最得意弟子），有幾句詩云，他年得遂投閑計，祇對青山不著書。莫嘆老慵無著述，眞儒不是鄭康成。凡此，都可以窺見他們很看不起所謂學問的那種氣派。他們並非不要學問，不過他們

認定學問之最終目的，是在完成其人格，使人格無缺，成爲壹個完人，俯仰無愧，而可以與天地自然相合。他們之所謂學問，就是這種學問，除了這種學問之外，壹切學問都不是學問。不然，嚴嵩，秦檜，錢謙益，阮大鍼之流，亦何嘗無學問？他們所差者，就是這方寸之間耳。所以，致據之學，在滿清百餘年間，風靡壹時，而在嶺南，則好像漠不相關，第壹，自然是因爲嶺南文風閉塞，事事落後，第二，則壹班讀書人，未嘗不多多少少，受了壹些白沙的影響，對於這種訓詁章句的學問，不容易能夠接受。

本來清初的樸學，就是對明代理學所起之壹種反動，不過這種反動，主要的是以王學（陽明）爲對象，因爲王學在末流，流弊極大，二溪（龍溪近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人，舌底瀾翻，自謂探幽抉微，而其爲說愈精，去道愈遠（仇兆鰲語），到了後來，更跑出壹班所謂「狂禪」高談，「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如此，真可說是墮落極了。壹種學問弄到這樣，當然是要生出反動的，這是王學崩潰，樸學崛起之壹種由來。至於嶺南，則自爲風氣，白沙之學，自成壹家，由明成化以至於清嘉道間，幾百年始終未曾動搖過。壹種學問既然不會動搖，則別壹種學問很難有取而代之勢，這又是樸學所以在嶺南不能發達之壹個原故。

爲什麼陽明之學後來會崩潰，而白沙之學不會崩潰呢？仇兆鰲在明儒學案序裏頭說得好

，他說，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爲闢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蓋道廣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于其中，而才高則聘其雄辯，足以驚世而惑人……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陽明之門，因爲道廣才高，其末流至有「滿街皆是聖人」的笑話，而白沙因爲闢修獨行，門限較窄，故流弊亦較少，故其聲教，能夠維持較爲久遠。大抵白沙之教，確是淡聲華而薄榮利，黃梨洲亦說，凡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故在其門人中，陳時周最爲刻苦，寒儉自持，以一身繫風紀之重。謝天錫則夷然物外，名利之事，纖毫不入。李大匡則胸懷灑落，自晤白沙歸里，卽築釣台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賀醫閭自從入白沙之門，卽澹然於富貴，故舉世譏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每每以醫閭爲藉口。至於湛甘泉，雖然官爵最高，任其人可以說殊非宰相才，其山林之氣，遠比朝市之氣爲重，故一做過幾部尙書，卽行致仕。這種淡於聲華，薄於榮利，闢修獨行的風度，又與羈人謫宦，孤臣遺老的遺民文化，有很遠的淵源，很深的關係。蓋必有孤臣遺老之苦節，之堅貞，之特立獨行，之孤芳自賞，然後有後來理學家之闢修獨行，之清苦自立，之淡聲華而薄榮利，其間前後相承，如出一轍，所以遺民文化必結晶於白沙之理學，而理學（白沙學派之理學），又必爲遺民文化之產兒。而今我們拿屈翁山陳元孝兩個人與顧亭林黃梨洲比對一下。這幾個人都是相等的，地位相等，品格相等，思

想抱負相等，聰明才智相等，身世遭逢相等，然因其所生長之理學氛圍不同，故其所表現亦不同。陽明勳業彪炳，事功最著，故梨洲亭林都是學者，不忘事功之念。（觀於明夷待訪錄一書即知）。白沙淡聲華而薄榮利，故翁山獨濃都是詩人，而有採薇之志，這大概不是偶然的事。

由理學而及於文藝，嶺南文士，就其最好的那些來講，亦保有一種風格。比如乾嘉一代，文風最盛，然中原各地文人，不免有一種聲華競尚的習氣，頗為浮靡，（尤以江南為甚）惟嶺南文士，沾染此種習氣較淺，隨便舉幾個人出來，如黎簡（二樵），黃丹書（虛舟），謝敦源（容若），難天尺（履先），可見一斑，這大概亦是文士中之能夠淡聲華而薄榮利者。白沙這種思想，一略延綿至嘉道以後，到了最後，做殿軍的，有一尊桂石，這便是朱九江（次琦）朱九江以後，還有一個人物，這便是簡竹居（朝亮），是朱九江的弟子。簡竹居以後，便如廣陵散丁了。

當時學海堂振起樸學之風，名器極大，然屢次聘請朱九江出任山長，朱九江均不就，雖求之三十年而終不可得。至於簡竹居，則對於當時之漢學（即所謂樸學），有幾句很嚴厲的批評。他說：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虜，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見簡竹居文錄）由此可見朱九江簡竹居兩位對

於當時所謂樸學的態度，同時亦可見理學在廣東根柢之深厚，對於漢學之富於反抗性而短於感受性。

而今有一點要聲明的。白沙這種虛靜自然，淡聲華而薄榮利的學問，並不是消極的，而實在是積極的。黃梨洲云，薛文清困於流俗，陳白沙激於聲名，又云，其高風之所激遠矣，又霍韜云，白沙有抗節振世之志。可見所謂「收斂近裏」，所謂「闔修獨行」，祇不過得其一面。其實白沙是很積極的，看他論禽獸這幾句說話，他說，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濃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看他這幾句說話，何等激昂慷慨，所以他最講究氣象，他教學者須先理會氣象，以求其自得，什麼叫做自得？他說，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看他這種氣象，真是欲以一心開萬世，其抗節振世之志，千百年後還可以從他的文章透露出來，所以他所主張的那種虛靜自然，自有他的見解，並不是消極的，這是我們要加以說明的。

白沙本來主虛靜，而有時不免激昂慷慨，這或者多多少少受了一些地理環境的影響。我們不要忘記，嶺南僻處嶺外，一方面是一個山國，又一方面是一個海國，而嶺南人民就是一

種山海野民，這種山海野民，一方面富於保守性，又一方面富於冒險進取性，以此民性，影響於民風，便有一種異樣色彩，溫汝能云：「粵東瀕大海，宅南離，山禽水物，奇花異果，如離支珊瑚玳瑁之屬，莫不秉炎精，發奇采，而民生於其間者，亦往往有瑰奇雄偉之氣，蟠鬱胸次，發於文章……」。又云，粵東居嶺海之間，會日月之交，陽氣之所極，陽則剛，而極必發，故民生其間者，類皆忠貞而不肯屈辱以阿世，習而成風，故其發於詩歌，往往瑰奇雄偉，凌轍今古，以開闢成一家言……此則東粵之風也。（見粵東文海粵東詩海序）。這所謂「瀕大海，宅南離」者，對於嶺南民性與嶺南文風，實不能無影響。故嶺南文化雖落後，文人學士，缺乏得可憐，但如果一旦有一個人跑出來，這個人便是一定是一個非常的人物，所謂不鳴則已，一鳴則驚人。嶺南學術文化，在明清兩代，完全受白沙學說的支配，便表現出一種白沙的精神，到了海通以後，政治社會經濟的情形大變，理學不復能夠籠繫社會人心，粵東學術便完全脫離理學的色彩，而另外表現一種別的色彩，這種色彩，大半受着地理環境的影響，與溫汝能之所謂「瀕大海，宅南離，陽則剛，極必發」者，有很大的關係，我們祇舉出孫中山，康有為，黃遵憲，這幾個人出來，便可以做一個例証。到了這個時候，粵東便一躍而入於另一環境，進入另一階段，與前者截然不同，（中國第一批出洋留學生梁敦彥詹天佑等三十人，便於同治十年由容闈帶領出洋赴美），關於這一點，我們留歸下一段，再行討論。

## 第四章 近百年來嶺南文化之特徵

我們在上面雖然講了一大堆的話，但無論如何，都不足以掩飾嶺南在學術上文化上之落後，之貧乏。白沙甘泉之學，雖然由明及清，支配了嶺南幾百年，但其末流，實不免於空虛，一如王學末流一樣，不過少幾個「狂禪」而已。但我們要知道，能夠講白沙甘泉之學的，這已經是最好的讀書人，除此之外，其他最多數的所謂讀書人（約爲十之八九），他們讀書之目的，無非爲着科舉功名，除了八股試帖之外，一無所知，一入了這一途，便與學問隔絕，（科舉與學問，爲截然不同之兩件事）。即以科舉功名而論，廣東亦比之別省差得很遠，（由明及清，廣東所出之狀元，寥寥沒有幾個，清末有好幾個翰林，資格差到極），所以，從學術文化來講，廣東在國內是絕無地位的。

在此貧瘠荒蕪之中，第一個替嶺南開出一個學問的風氣的，是阮雲臺（元），他於道光六年開設學海堂，第一次把樸學介紹來嶺南，這可以算是近百年來嶺南的一件大事，其後學海堂所開的第一朵花，便落在陳蘭甫（澧）身上，這是二百年來嶺南對中國學術能夠有偉大貢獻的一個人。

嶺南其實不止在學術上落後而已，其他一切，均無不落後，廣東這兩個字，從前一講出

來，差不多便爲中原所不齒，廣東能夠躍然而起，在中國舞臺，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完全是近百年來的事，從南越王趙陀至今，嶺南的歷史，已經有二千年，而最近之一百年，則關係最爲重大。

何以這樣重大呢？這完全是因爲海通的關係，而海通的關係，則因爲地理位置的關係。以他的地理位置，配合海通的運會，以其時，得其地，時與地一旦配合起來，嶺南便一躍而起。

所謂海通者、從政治經濟而言，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壓迫到我們的老大帝國，從文化而言，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航行兩半球，舊世界之世界觀，已經完全改造，因此，中國在東亞一隅，不復能閉關自守，既不能閉關自守，遂被驅迫而入於世界之舞臺，從此與五洲各國發生繁密的來往關係，而這種來往關係，廣東首當其衝，所以帝國主義第一次對華侵略戰（鴉片戰役），即發軔於廣東，廣東對此，當然受害很大，但天下事有利未必無害，有時有害亦未必無利，而廣東即在此禍害交迫之下奮興起來。平常人說，中國文化，一路南移，最初爲大陸文化，以北部平原爲中心，其後南移，進而爲江河文化，以長江流域爲中心，最後則應進而爲海洋文化，以沿海一帶爲中心，這幾句話雖然不免言之太籠統，有許多語病，但海洋文化（世界文化），無疑的是從十九世紀已經湧進來，而廣東適當海洋之衝，因

此便事得風氣之先，這一點……事事得風氣之先……便是廣東所當以擬據直上者一個大關鍵。

本來廣東在歷史上早已乎就是一個對外交通和接受外來文化的最前哨。中國在歷史上，對外交通，向來有兩條路線，一條陸路，一條水路。陸路出玉門、敦煌、經于闐、和闐、莎車、疏勒、逾葱嶺、而至天竺。水路則經徐聞、合浦、九真、日南、出海而通波斯。這兩條路線，到後來還是水路戰勝，走水路者往往十之七八，而走陸路者祇十之二三。（漢桓帝延禧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來貢，即走水路）。到後來陸路簡直不通，水路乃獨擅其勝。廣東與海南（即印度南洋）諸國交通，遠在漢武帝之世，其時徐聞合浦是中國對外交通的發舶之所，往來市舶，均寄碇於此，而合浦出產珍珠，一如後來的波斯灣一樣，所以有合浦珠還的故事，因此尤為有名。六朝以後，廣州與外國交通大盛，其時大食國（阿剌伯）商人在廣州已有居留地，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氏亦言，中國對外洋交通的路線，第一條為交趾，至七世紀時，交趾的地位，乃為廣州所奪。至唐朝，阿剌伯人興起，南海方面，海上貿易極為繁盛，於是廣州的地位，更為重要，掌握了海外交通的總樞紐，據說在黃巢亂時，廣州有波斯大食商人十餘萬人。

因為如此，所以廣東為接受外來文化之第一個門戶。達摩初來中國（梁朝），即先到廣

州，而今廣州西關下九甫尚有一條街名「西來初地」，即紀念達摩初來之蹟，至於西來初地之華林寺，相傳就是達摩所建。其時印度高僧，不斷的航海而來，廣州城西之光孝寺，算是嶺南第一個名剎，六朝以還，高僧駐錫於此者很多，相傳有一個梵僧名智藥，由西竺航海而來，帶來一株菩提樹，把他種在戒壇前，預言日後有肉身菩薩在此受戒，果然後來六祖慧能就在此株樹下祝髮（唐高宗時）。至於韶州的南華寺，這是六祖的演法道場，相傳六祖在這裏傳黃梅衣鉢，所以衣鉢與真身，都留傳寺內。這就是廣東接受外洋文化所開的第一朵花。

除了佛教的印度文化之外，廣東還接受了一些阿剌伯的回教文化。廣州城西有一個番塔（即光塔，其下有光塔街），起於唐朝，名懷聖塔，據昔日所記云，懷聖寺在府城內，唐時番夷所創，有塔曰懷聖塔，其形圓，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類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其風信，下有禮拜堂云。按這個塔是一個回教塔，這種風俗是一種回教風俗，所謂叫佛號，是叫謨罕默德之號。據云。塔頂金雞，於明洪武中被颶風吹墮，故粵人稱之爲光塔，但同時亦有稱之爲番塔者，這是回教阿剌伯文化之一個標記。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講一講。廣東多素馨茉莉花，此花已經成爲廣東之特產，與果木中之荔枝木棉，同樣出色。從前廣州城西十里（約有西關之三角市），有一個地方，名

叫花田，亦名素馨斜（註），其地廣種素馨茉莉花，相傳南漢宮人，葬於此處，所以有一種神話，說是每逢月夜，輒聞宮人唉聲。這種花是那裏來的呢？是阿刺伯來的。所以在古書上茉莉花亦名「耶悉茗」所謂耶悉茗，即 Yasinia，這是一個阿刺伯的名稱，後來西洋各國，都一律採用，而中國最初則照音直譯。這又是廣東接受外洋文化所產的一朵花（這是真真正正的一朵花）。

（註）據張心泰所輯粵遊小志，記花田一段云，花田爲南漢宮人葬處，名園畫舫，選勝之所，其間花最繁盛，素馨茉莉二種，尤爲他處所罕見，綠雪芬鋪，望之彌畝，城中童老，課花作生涯者，多取給是焉。日沈燈上，雲破月來，市巷中陳設幾遍，澹紅香白，罨靄衣香人影間，花事之盛，是足紀矣。

到了後來，意大利天主教士，如聖方濟各，利瑪竇，羅明堅等來中國，也是先到廣東。利瑪竇曾經在肇慶住了好些時，然後往韶州傳教，其後乃踰梅嶺，入南北二京，所以肇慶現時，尙留存當時修士會 Jesuits 之一種組織，這是西洋科學傳入中國之第一把火炬。又其後，馬禮遜來中國傳佈基督教（新教），亦注全力於廣東，（現時馬禮遜之墓即在澳門），這都是廣東與外來文化所發生過的一些關係。

我們還沒有講到廣州和諸蕃貿易的情形怎樣。當時海南與廣州通商者有林邑，扶南，真

臘，波斯，大食，古邇，閩婆，占城，那些國家，他們販運來的商品，有龍腦，沐香，丁香，荳蔻，珍珠，珊瑚，玳瑁，瑪瑙，琥珀，犀象等物，那些海舶，歲歲均來廣州，海舶有種種的名稱，番舶，蠻舶，南海舶，波斯舶，峴寮舶，師子國舶，不一而足，就以師子國舶爲最大，其梯上下數丈，都堆滿了寶貨，在廣州交易了之後，由廣州而轉販於國內各地。因爲海上貿易這樣繁盛，所以廣州在唐朝便設立了一個市舶司，（後來宋元明幾代亦有同樣的設置），管理海外通商事務。其時的廣州，中外都稱爲「廣府」，廣州城下，海南諸國的船舶，如雲屯霧集，雖意大利之威尼斯，在中世紀時代，亦不過如是。夷人住的地方，有「蕃坊」，這是一個特別地方，其中有蕃長，所以後來廣州設一「懷遠驛」，在而今西關的十七甫。

因爲嶺南的地位如此，所以夷人來歸附者，時有所聞，宋太平興國間，嶺州報告，占城國人有百餘家來歸附，因爲受交趾的壓迫。雍熙間及端拱間。亦有大批占城國人來歸附，分隸於南海清遠縣籍。明洪武以後，嶺南與海外貿易，愈加頻繁，粵人因此遂亦伸展其勢力於海外，而從事於開疆拓土的事業。鄒和下西洋（南洋），粵人在爪哇一帶已經穩植其勢力，爪哇侵三佛齊，國內大亂，其時粵人旅居三佛齊者千餘人，有南海人梁道明者，號召而部勒之，保衛國境之北部，與爪哇相拒，爪哇不能勝，閩粵軍民從之泛海者數千家，遂爲三佛齊之領袖，此事見於明史記載。洪初暹羅爲緬甸攻陷，國王被迫死，前王被擄，暹羅全國大亂

有潮州人鄭昭者，時仕於暹羅庭，興師討伐緬甸，驅逐緬人，恢復暹羅，建都盤谷，遣使入貢清庭，暹人擁之爲王，傳至其子鄭華，遂爲後來暹羅王之始祖。這件事見於聖武記，流傳更廣，知者更衆。此外羅芳伯之於坤甸，張傑諸之於爪哇，葉來之於吉隆坡，鄭玖之於南圻，林鳳之於小呂宋，每一個人都不失爲一個海外扶餘，都有他的一番功業，開闢草萊，建立社會，凡屬後來的南洋，都莫不由閩粵兩省人爲之開創建立，而尤以粵人爲尤甚，這些事實，已不止表明海外文化之輸入來嶺南，而且嶺南文化，已經吹送到海外了。

總之，對外交通愈頻繁，則廣東之地位愈重要，廣東之所以重要，完全是由於其地理上之位置。近百年來，海禁大開，各國（海南諸國以外）來往之關係，與海洋貿易之關係，又不知比從前發達幾多十倍，廣東因爲地理上之關係，首當其衝，於是躍然隨之而發達，成爲對外貿易之惟一之重心，羊城的十三行完全壟斷了當時的對外商業，因爲對外商業發達，所以對內商業亦隨之而發達，因爲內外商業發達，所以整個產業界都隨之而發達。產業發達，當然賦稅增加，賦稅增加，其政治上之重要性亦隨之而加重。同時因爲海疆與邊防之重要，亦李重其政治地位之重要，所以清末派來做兩廣總督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大員，如彭玉麟、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岑春煊等，清庭所以付以海疆之寄，是因爲對於廣東的地位，特別看得重。這一切都足以證明廣東因爲經濟地位之提高，影響到政治地位與其他一切地位之

提高。

廣東從前在政治上是沒有地位的，但後來不然了，清庭所倚以腹心，寄以重托的，是一等大員，同時粵人在政治舞台上之活動，亦呈一種空前的現象。滿清政府本來對於漢人壓制得很利害，然粵人中如唐景星、許應麟、梁鼎芬、梁敦彥、梁如浩、陳超常、伍廷芳、戴鴻慈、唐紹儀、梁士詒、溫肅、梁慶桂、程璧光、凌福彭、譚學夔等都能夠居高位，秉權柄，這是以前廣東所無的。這個時候，廣東在政治上的地位，至少是與蘇浙魯豫各省相比，而兩廣總督的地位，則與兩江總督兩湖總督齊驅並駕。

廣東從前在學術上也是沒有地位的，但後來也不然了。粵人在學術上漸漸抬頭了，除了張維屏、黃培芳、陳澧、梁廷禧、鄒伯奇諸人，繼承着中國學術的正流之外，廣東從自身突起了一枝異軍，後日便成爲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先鋒，之旗鼓。嶺南從前的遺民文化，經過幾百年理學之陶冶，經過明亡之慘痛，經過二百餘年秘密會黨之醞釀，經過太平天國之教訓，再加之以海通以後世界潮流之激盪，遂孕育而成一種嶄新的文化——革命的文化。

我們尋繹遺民文化演變的痕跡，知道他第一步結晶於白沙的理學，第二步則結晶於近百年來之革命文化。故理學與革命文化，都是遺民文化的子孫，一個稟賦了他的苦節，的孤芳

熱血滿懷，而澎湃磅礴。而今歸結起來，這兩個子孫，都是遺民文化之嫡傳，一個等於鐵錘，一個等於朝陽，一個是內斂的，一個是外放的，一個是心靈的，一個是氣魄的，一個是邏輯的，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整飭嶺南文化之家風的，一個是光大嶺南文化之門楣的。然則遺民文化對於全部嶺南文化史之地位如何，可以見矣。

中國的學術思想，二千年來，可以說是循着一條路線運行，並無多大的變動，這是因為中國向來閉關自守，其周遭的環境，無多大變動之故。然自滿清末葉，經過一次二次之戰爭，着着失敗，入了一個亘古未有之奇局裏頭，於是中國的學術思想，遂亦隨之而起了一種亘古未有之變化。自有此變化，中國遂一轉而入於第二個階段，即所謂現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頭，不特以前的學術思想，起了變化，連一切政治社會道德風俗之基本信仰，都爲之動搖，這真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大革命，而這個革命，可以說就是嶺南的產物。

無論何人，凡稍稍研究過一下中國現代史者，都無不承認，自甲午或者戊戌以後，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界，都被兩種潮流支配着，一種是革命的潮流，領導者是孫中山先生，一種是君憲的潮流，領導者是康有爲與梁啟超。這兩種潮流，在民國以前，都一樣的有勢力，彼此旗鼓相當，到後來革命潮流戰勝，君憲潮流乃掩旂息鼓，雖是掩旂息鼓，但仍然有一種潛勢力，始終在運行着，這兩派的領袖都是廣東人，兩派的活動，都是以廣東這個地盤做出發

點，（在孫中山的旗下，有陸浩東，史堅如，楊衢雲諸人之革命，在康有為的旗下，有萬木草堂之組織），同時効力於這兩派活動之最初勁旅，都是一班廣東人，這可以充分証明廣東這個地方之富於矛盾性。孫中山先生之思想，很顯明的是承接著世界最新的潮流而來，其學說現時已經家喻戶曉，無須我們再為介紹。至於康梁一派，其領袖之為人如何，其所倡導之運動，價值如何，功罪如何，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暫且不談，我們此刻所注意者，是就廣東一方面之立場，觀察其發於廣東，而散於全國之一種影響。在革命運動裏頭，四十年來，始終其事者，完全是孫中山先生一個人，但在君憲運動裏頭，則分為兩截，頭一截倡之自康，第二截繼之為梁。康有為這個人有絕大聰明，他的思想是閉門讀古書讀出來的。比如他在滿清末年所著那篇「大同書」，是根據禮運大同及孟子的理想而來，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其中所言，有許多與西歐所倡的社會主義相暗合（註）。他後來雖然到過外國，但對於西方的學術思想，一些兒的影響都受不着（這是他的壞處，絕不是他的好處），至於梁啟超，雖然亦是從舊學起家，但是受西洋思想的影響受得很深。

（註）大同書之要旨如下：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四、婦女有身者入胎

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爲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備爲最嚴之刑罰。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

大約自庚子以後，君憲派的運動（至少在文字思想一方面），便完全以他爲柱石。他們雖然倡導保皇，但因爲政變失敗，有有些人被拿被殺，其餘一部份被迫逃亡，所以對於當時執政的滿洲大員，亦恨之刺骨。因此，革命派固然是講革命，他們也講革命（在新民叢報初期，革命字樣，屢見不一見），革命派固然是講民權，他們也講民權，彼此都以十八世紀西歐的政治思想爲其理論之出發點，所不同者，一派主張澈底的推倒滿洲政府，從頭改造，一派則主張維持現狀，加以改良而已。梁啓超所辦的叢報新民叢報，勢力極大，有許多大官，名則禁止，而暗則偷讀，他又曾經到過湖南講學，佈下不少種子，所以，在這兩派運動裏，革命派比較劇烈的，急進的，澈底的，是從外面壓入來，君憲派比較溫和的，緩進的，是從裏面湧出來，這兩派雖然有許多相反的，衝突的，絕不能相容的地方，但同時亦有不少

共通的，可以相合之處，（我們講這話，始終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來講）。這兩種運動，雖然都是以廣東這個地盤做出發點，但轉瞬之間，已經變而為一種普遍的運動，非復廣東一省所得而專有，他已經成為全國的運動，其勢力已經瀰漫於全國各地，無論那個地方，無論那些人，不為革命黨則必為君憲派，如果兩者都不屬，那不是頑固守舊，便是落伍退化，幾乎不齒於士類。

因為如此，所以在全國裏頭，都形成一種如火如荼的思潮，無論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道德倫理方面，風尚習俗方面，學術與教育方面，都受到思潮的侵襲，在幾千年來的專制政治之下，第一次聽到民權的呼聲，第一次聽到自由平等的呼聲，在階級重重的社會裏，第一次聽到博愛的呼聲（大家都以同胞相叫，同胞這種普遍的稱呼，是從這個時候起），第一次聽到男女平權的呼聲，與婚姻自由的呼聲，在幾千年來的學術系統裏，第一次拋棄傳統的舊路，而另找一條新路，這真是幾千年來中國文化史上之第一次大變動。其時人人談革命，個個講民權，講革命講民權之書報，及盧騷民約論，孟德斯鳩法意，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之譯本，傳誦一時，人人人口上，都掛着自由平等，維新進步，文明鼓吹，方針目的等新名詞，這簡直是十八世紀大革命前夕的法國一樣，這可說現代中國之第一線曙光，亦可說中國從此永遠擺脫了中古時代的氛圍，一躍而入於廿世紀之現代世界。這是中國由「中古」而入

於「現代」之一個大關頭，以後中國更有如何的進步，更有如何的新花樣，都無非在這個時候植其始基，爲其先導。可惜現時有許多人，都未能澈底明瞭這一個轉變的關鍵，對於這一個這樣重要的時代，未能把他把握住，對他沒有一種認真明亮的，認真深切的認識，（關於國內的出版物即知）。

因爲這種思潮這樣的如火如荼的壓迫過來，所以在社會上，在政治上，不能不有一種事實上的反應，雖然滿洲政府是這樣的敷衍，這樣的作偽，這樣的不願意，但無論如何，多多少少，總要表現一些事實，即使假的，也是事實，違心的也是事實。拿我們廣東來說，在政治上開始了一種代議制度，設了一個諮議局，這是後來省議會省參議會的先驅。在法律上廢棄了舊時司法制度，設了幾級的審判廳，施行新訂的法律，到現在還是一樣。在軍事上拋棄了舊時的巡防綠營，另立現代的軍事制度與軍事教育，開設了幾個軍事學校（水陸兩師），編練了幾師（當時稱鎮）很好的新軍，（民國以來，廣東大部份的軍事領袖，都是從這裏出身）。在教育上廢了從前的科舉考試，開設了好些學校，如高等學堂，方言學堂，法政學堂，兩廣師範學堂，（這都是中國小學的前身）。還派了幾批出洋留學生（胡漢民汪精衛等都是當時派出）。此外還有很多，如關於省會治安的，有巡警道，關於實業的有勸業道，關於建設的有官商合辦的粵漢鐵路，電燈公司，自來水公司等，不一而足，凡民國以後所有的一切，都

由當時奠其始基，大約各省情形，都大同小異，這許多事實，許多建設，雖然都是被動的，而非自動的，半消極的，而非全積極的，但無論如何，總是創始的，空前的。

至於人民在積極的自動的一方面，那些活動，更爲可觀，那時滿清政府愈弄愈腐敗，而外患之壓迫，而愈來愈甚，人民懷於邦國之危亡，於是奔走呼號，大有欲得滿洲政府而甘心之概，那個時候，民氣之盛，民情之激昂，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他們到處開學堂，辦報館，集會演說，肆意指斥朝政，批評時事，（這是受到天賦人權，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學說的影響），所以當時的輿論，確實有一種力量，足以監督政府，指導人民，每逢有一件事發生，則報紙先加之以批評，人民隨後加之以響應，如果輿論不能取勝，則激而爲風潮，所以當時風潮最多，而人心又好動，加以民氣又這樣盛，所以無時無地無風潮。那一班所謂新志士，真好像是生長在風潮之中，自美禁華工，發生過拒約風潮之後，一路有二辰丸的風潮，粵路的風潮，禁賭的風潮，和記不清的許多許多風潮，至到光復之前一年，已經有人搗毀君憲派的報館，街頭巷尾，都有人演說，大聲疾呼，鼓吹革命，抨擊政府，這些都是公開的活動。至於秘密的呢，則有種種的組織，香港澳門兩地，成爲策動的大本營，表面是學校，是報館，而內裏則爲機關，有好些女學生，已經不讓男子專美，而來往奔走於省港四鄉，担任傳遞消息與私運炸彈的工作，所以在廣東一省裏，革命與暗殺之事特別

來得多，辛亥三月廿九之役，震動全國，而滿清所以覆亡，民國所以建立，即由此做一導火線。

上面所管，不過是說明在廣東省內當時所表現的一種情形，亦即說明在整個大潮流當中，廣東以其局部地位，負其所應負的一部份的使命，盡其所能盡的一部份的貢獻。但我們始終不要忘記，這個思潮，本來發自廣東，最初是以廣東為發動的大本營，如果我們從這點着眼去看，則廣東所負的使命，和他所有的貢獻，便不可同日而語。何以廣東會有這個貢獻，會有這個使命呢？這就是近百年來，中西溝通之一個大關鍵，廣東以其地理的位置，當海岸之衝，得風氣之先，握住了這個時間與空間的鎖鑰，這個使命使自然而然的落在他的身上。假使這個使命不落 他的身上，而落在別省身上，這能不能呢？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我們祇拿一件事來講，廣東有許多華僑，遍佈海外，這正是製造革命黨，收容亡命客、籌措革命軍費，策動革命工作之一個最好的天然的地盤，假使沒有海外華僑，革命便很不容易有成功之望，連康梁諸人，亦無法可以進行保皇會的工作。祇就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出廣東的重要性，何況尚有其他之種種條件？所以，入了民國以後，張勳垮台，黎元洪出走，曹錕南下，國會南遷，組織軍政府，倡言護法，是以廣東為大本營，到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亦是廣東為大本營，這好像時勢推移，特別顯出廣東負起這種工作的使命。而廣東於此，遂躍然

##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 五四

居於一個很重要的前哨的地位，這是過去二千年嶺南歷史之所無的。我們研究廣東，須特別  
着眼於此，這便是近百年來嶺南文化之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 第五章 嶺南文化之暗流

嶺南文化，由曲江清獻及唐宋以來之羈人謫宦，孤臣遺老，開其先河，由明以來白沙甘泉諸人承其統緒，至近百年來，海禁大開，與世界的文化潮流接觸，一轉而爲一種領導的革命的文化，其間一千餘年，這種潮流之運行，我們看得很清楚，這可以名之爲嶺南文化之主流，沛然運行，其勢是很旺盛的。不過這個主流運行的過程中，近百數十年來，却生出一個暗流，在那裏潛行着。這個暗流，其初暗暗滋長，慢慢流行，到後來澎漲起來，乃泛濫橫溢，大有壅塞了主流，而奪去他的河道之勢。所以廣東之好，是好在近百年，而廣東之壞，亦是壞在近百年。百年以前，廣東尙屬一幅邊徼之地，很微弱的接觸到一些中原的文化，雖然文化落後，然人民生活簡樸，古風尙存，同時因其沾染中原人士之氣質不深，故嶺南士夫，得免於中原人士浮靡之氣（袁子才來廣東，黎二樵聲其罪而攻之）。近百年來，海禁大開，因海運興通商關係，廣東驟然臻於繁榮，找出一條新的發展的途徑，這一條新途徑找到，從前的舊路，遂漸漸梗塞了。

此百年間有一個大關鍵，影響於廣東文化至鉅，這是洋務的發展。羊城之十三行，本來很早即已開設，但其最發達之時期，則在鴉片戰役之前後。此十三家商行，握有中國對外貿

易之特權，無論輸出輸入，都經其手，最易發財而成豪富，所以廣東有「銀錢堆滿十三行」之謠。（後來十三行雖付之一炬，但一直到而今，廣州之銀業中心，及所有大銀號，仍聚於此）。記得彭玉麟也會說過：「咸豐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販，悉聚於廣州一口，當時操奇計贏，坐擁厚資者，比屋相望，此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亨豫大，尤天下所嚮稱，遇有集捐之事，巨萬之款，咄嗟可辦。」此十三家商行，以潘同文、盧廣利、伍怡和、葉義成、四家爲最大，世所稱之潘盧伍葉，即指此四家，其後伍怡和一躍而居於第一位，道光中葉，伍浩官（崇曜）之財產，多至二千餘萬，可見其盛。從此以後，各國來往愈頻繁，通商愈發達，洋務之地位愈重要，從事於此者愈衆，以此起家者亦愈多，這個時候，洋務大有籠罩一切，凌駕一切，執經濟界牛耳之勢，其能稍稍與之掎抗者，祇有鹽商，所以廣州最富庶者有兩個區域，一爲西關，一爲南關，一則代表洋務，一則代表鹽務。同時因爲廣東政治地位之躍起，仕宦階級隨之發達，於是又崛起一個北關，這三個關（西南北）之發達，實與當時海通之發達，商務之發達，有密切的關係。南關雖然與西關對立，但一部份爲西關所兼併，因爲十三行除辦洋務之外，兼辦鹽務，及其他足以生利之事業。北關雖然與西關表面上並無多大的關係，但有一份爲西關勢力所侵入，雖然此以其貴，彼以其富，但一比較起來，則富終勝於貴，因爲一有錢，即可以買官，婚嫁可以攀門第，可以廣交結，所以廣州西關可以

視為百年來洋商文化之一個結晶，這個結晶結成了之後，即散其光輝於各地，其始為廣州，使廣州變為西關化，又其次為各縣，如順德之大良龍山，南海之佛山九江，香山之石岐，番禺之沙灣市橋，使各縣變為西關化。

從廣東相當鄙陋，吳震方嶺南雜記，有一段載稱，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圍圍則纏之，婦人婢女，俱赤足行走，凡親戚盛禮之饋送，俱以婦女挑負至人家，然後袖中出鞋着之，出門，仍赤足去！這本來沒有甚麼，不過在中原人士看來，便覺得粗鄙野陋到極，因為嶺南一切的一切，本來都是粗鄙野陋，無足為諱，然自洋務蔚起，西關肇興，那就不同了。潘仕成之海山仙館，究竟如何，我們已經無法可以目睹，然從外國人所繪當時十三行商人住宅那些圖畫看來，層樓高閣。園林水榭，清流畫舫，花木掩映，則真使人覺得這是一个神仙水府。而今不遠萬里，祇講近向。試看看西關寶華、寶慶、逢源、多寶、十八甫富善西街、富善東街、上西關蘆荊巷、老城豪賢街、及順德大良，那些幾面過的大堤，這藝術道和這種建築，至少在門口上是全國第一，又如食品。廣東的食譜，至少在點心方面，是極受揚州與蘇州的影响，吳梅村詩，淮揚服裝擅江南，這是一種實況，所以廣東點心有許多冠以「揚州」或「蘇製」的名號，這亦可證明廣東文藝之由外面移入，但後來廣州點心已經超出揚州蘇州之上了。凡一切起居、飲食、服用、居室、婢妾之事，西關都形成一種派頭，窮

奢極侈，相習成風，由此而影響於全個廣州，以至於廣州以外之各縣。其時廣州的洋商，足與淮揚的鹽商相伯仲，（所以淮揚的文化，可稱為鹽商的文化）。繼潘盧伍葉之後，清室有一個周東生，亦叫作周老十，他所住的七面過大屋，就是寶華正中約，民國十五年以後有一部份改爲寶華戲院，當時香港世界公益報記者黃世仲（署名世次郎）寫過一本小說，名曰「繁華夢」，傳誦一時，就是描寫周東生二十年間之興衰起伏，在這本小說裏頭，我們可以約略見到他家裏那種生活之奢侈。

洋務與海關，關係最密，大約對外貿易愈繁榮，則海關隨之而愈發達，所以起家者，是從洋務，便是從海關，（周東生即以關務起家），當時的舶來品，如佛山倒海，大量的輸入來，增加一般人在物質上享受，因此，除了淮揚的點心，蘇杭的絲綢，和國內各種各色山珍海錯之外，那些豪富還同時享受到許多舶來的洋貨，所以十八甫的翼光公司，便是國貨開設百貨公司的第一家（上海之開設先施永安等公司，遠在民國以後，天津的中原公司更不必說），這樣一來，他們在生活享受中，便滲入一部份洋化的色彩，食則西菜，西餅，西糖菓，外國罐頭，着則棉毛織物，皮革靴履，用則有各種各色的洋貨，同時因爲海通的關係，一般又愛談洋務，讀洋文，不知不覺中，遂形成一種「洋商的文化」，此在嶺南文化過程中，爲一極大之關鍵，極大之轉變。

然此不過表示廣東因爲通商發達，經濟繁榮，而生出的一種轉變，尙不若如何尋常。眞真正正爲害重大者，則爲烟賭與捐務，這幾件事，事雖不同，而性質則一，可以拿來作一件事看。

自海通以來，鴉片卽源源輸入，鴉片戰役，卽因此而起，（龔定庵己亥雜詩，有碧紗櫺護阿芙蓉一句，已慨乎言之），自鴉片戰役後，此物輸入更多，暢行無碍，又因其能夠獲大利，故做鴉片烟生意者，愈來愈多，所以海通以後，有很大部份的富豪，都是由鴉片起家，由羊城的十三行，而至香港澳門兩地，再由此而至上海，鴉片生意，都是由粵人包辦，（在上海則以潮州人爲巨擘），因爲鴉片生意亦是一種洋務，同屬舶來之品，而獲利則較其他各種洋貨之上，故鴉片又在洋務中居第一個位置，這就是鴉片與洋務之一重要關係，而我們所以說洋務爲嶺南文化之一個暗流，卽以此。

鴉片戰爭，本來起于廣東，鴉片輸入，本來以廣東爲最巨，鴉片生意，本來由粵人包辦，但後來（民國以後）這種生意在廣東却一落千丈，其故因爲一、在海牙和平會裏頭，中國宣言禁烟，英國同意印度烟土之輸出，每年遞減，洋土之生意，逐年衰落，二、護法軍興，因爲軍費浩繁，四川雲南貴州福建山西陝西鄂西湘西各地，廣事栽種罌粟，鴉片飛躍的大量產生，這樣一來，土貨（雲貴土）振興，便把洋貨（印度土）打倒。

廣東當然一路的仍然有人販烟，但鴉片貿易的地盤，已經不在廣東，鴉片貿易的路線，已經由海道而移入內陸，鴉片貿易的主權，已經不 粵人手裏，所以，自民變以後，甚而至滿清末年，單獨靠鴉片起家者，可以說絕無僅有，所以在烟、賭、捐、這座三品樓富中，洋烟拆夥出來，便變為賭、捐、之一座兩儀軒，賭捐這兩種東西合起來，便成爲廣東文化之一個最利害的最劇烈的時症，氾濫起來，使吾粵三千萬人，有「載胥及溺」之慨。

粵人生性冒險，早已經好賭。然賭博從 懸爲厲禁，自李鴻章來粵，藉口府庫支絀，籌設海防經費，公然開賭。番攤一，賭博得到官府的特許，賭餉視爲國家之財源，於是賭博之風大熾，這真是千古一，賭博之後，有圍姓，白鴿票，山票，舖票，層出一窮，到了民國以後，軍事頻繁，賭博政府第一件事は籌餉，籌餉即設籌餉局，而開設籌餉局則等開賭，所，自李鴻章開賭以後，廣東崛起一賭商，與鴉片烟商并駕齊驅，其勢力甚且凌駕烟商之，其最著名者爲劉學詢與李世桂兩人，朋比爲奸，以圍姓三搗亂科舉，所以當時有謠言說：「一文有劉學詢，武有李世桂，若圍姓，逐世！」（從前廣東大學，後來國民大學喬家鼐教授，本有年事，而屢次，則因爲被圍姓搗亂）。粵省張鳴岐，局有一班叫做「否議員」，（註：雖然公開的提出反對，可見此輩勢力之盛，所以，繼潘盧在葉而起的，後來另有一張富豪，這就是劉學詢，蘇星衢，綽號蘇大潤，朱若芝（花鏡來）

蕭瀛洲等，都是以賭博起家，和以前之以洋務起家者，完全兩樣。除了廣東之外，上海法租界之開大賭館者，南洋各埠之承賭碼者，都是廣東人，而且是廣府人，好像廣東人對於賭博有一種不可分的關係。

(註)與之對抗，而贊成禁賭者，則有一班「可議員」，因此辦了一間「可報」，以陳炯明爲之首。後來可報被封，主要原因是因爲講革命，但因時亦因爲否議員含恨，從中挑動，以圖報復。

承辦捐務，這是捐稅中一種包商制度，其起源甚遠，然其發達，大約是有了厘金以後，水陸設卡，各處卡廠林立，公家因爲一則不十分熟悉地方情形，二則因爲卡廠太多，一時不容易派人辦理，爲省事計，乃委托商人承辦，每年由商人認繳餉額多少，公家收到認繳之餉額，卽一事不問，所有設卡收稅，完全由商人包辦，這叫做承辦捐務，這種商人，就叫做捐商，又因承捐的公司，門前都掛着一塊虎頭招牌，所以又稱爲做虎頭牌生意。這種制度，最初本來未嘗不善，承商未嘗不是替公家做事，但後來日久弊生，則一方面剝削公家，一方面壓榨人民以自肥，此輩非官非商，亦官亦商，於七十二行之外，另添一行，初時包捐種類，並不很多，但後來愈做愈發達，則無捐不包，無稅而非承辦，由厘金賭博，以至屠宰，烟酒、典當、寶燭、垃圾、糞溺，都無不有承捐的公司，凡公家想不到可以徵稅的地方，都由商

人鉤心鬥角，曲曲為之想出種種抽捐的方法，於是捐稅愈繁苛，承辦的捐務愈發達，初時祇由商 操奇計贏，後來則官商勾結，由地方紳士或商人出面，而由軍隊或官吏為之包庇，故又崛起而為一種新勢力，構成一個新階級，其聲勢之浩大，遠非從前之賭商所能及，這又是廣東所特有的一種現象。

因為捐商與賭商的勢力這樣大，同時這種勢力已逐漸的滲入一切，所以嶺南文化於不知不覺中，又來一個轉變，此則真是一條很利害的暗流，我們無以名之，祇可名之為捐商賭棍的文化，（此之所謂文化，以曲義言之），他是繼洋商文化而起，而混入洋商文化之中，成為三廣洋商七成捐賭之一種混合文化，然因其面目惡劣，為簡便計，最好還是稱之為捐商賭棍之文化。這種文化現時已經滲入整個社會之全面，所有從前之社會道德，善良風俗，都為之毀滅無餘，廣東之本來面目，為之完全改變，而廣東現時所以壞到這樣，便完全由此而起，我們研究廣東政治社會之壹切問題，都應該特別着眼於此。

在從前洋商文化的時代，學海堂之流風尚存，潘仕 伍崇曜雖然以洋務起家，仍不惜出重資刻一部海山仙館叢書，一部粵雅堂叢書，為嶺南文化，點綴不少，但自劉學詢，李世桂，朱瑄，蘇大闢之後，有甚麼呢？簡直是一無所有。又從前各縣各鄉，都有書院，崇奉先賢

戒游惰，禁烟賭，有很多鄉鎮，如九江白沙等鄉，都立有很好的鄉約，這不過是四五十年前的事，長輩猶言之鑿鑿，但後來呢？則不然了，鄉紳坐局，其目的無非在公箱，一面則收烟規，同時承辦地方上各種捐稅，我們試放眼看一看，當時全省一百縣，幾千個鄉鎮，有什麼東西呢？我們可以數得出的，是每個鄉鎮一定有一間局所，幾個稅卡，幾個捐商公司，幾間攤館，幾間烟館，一間或兩間小學校，這就是鄉鎮文化（或者地方文化）之一種特徵，亦即捐商賭棍的文化已經普遍於全省各縣各鄉之一種表現，無怪現時的鄉紳都被稱爲土劣，何以會變爲土劣？這完全是烟賭與承捐，與捐賭影響的關係。

拿廣州一個地方來講（這是廣東的省會，關係很大），前後祇不過三十年，便已經面目全非，從前之時節，如新歲端陽，七夕，中秋，極能引起人之美感，（中國的歲時，實最富于詩意，而最淡於迷信成份），新歲的春聯，從前人家頗爲講究，我還記得兒時所居，巷口有一對春聯，用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兩句，當時印象很深，後來無論跑到海角天涯，都還記得，尤以思鄉撩動之時爲尤甚，但現時廣州已經無人講究春聯，即此已經減去歲時中無窮之美感之詩意，至於中秋七夕之非復舊觀，亦社會生活及生活藝術上，受到很大的損失。從前五羊城裏，小販沿街叫賣，音調非常講究，這是民物殷阜，風俗醇雅之一種表現，我最愛的是賣花聲，（賣花聲與爆竹聲是吾粵最美的兩種聲音），每逢春二三月

，或者清和時節，或者初夏晚晴，門巷叫賣素馨茉莉，這種昔調，聽來最足蕩人心魂，此外音調之美者，尚有叫「淘井」聲，深夜擊柝聲，七夕叫賣油甘白攪聲，無不帶有一種韻致，此即廣州之一種色彩，與廣州之一種情韻，此種特殊之色彩，與特殊之情韻，惟廣州有之，而非任何一個地方之所有，亦猶之別的地方，有別的地方的色彩與情韻，而為廣州之所無。大凡一個地方，能夠繫得住其地人民之心情，之留戀，之愛慕，之嚮往者，皆此種特殊之色彩與情韻為之。凡壹個地方而無壹種特殊之色彩與情韻，其地即絕無價值之可言，英國之牛津，法國之巴黎，奧國之維也納，意大利之羅馬，之威尼斯，之佛羅稜司，所以聞名，即以其地方風物與地方色彩之故，此等地方風物與地方色彩，即其地最高文化與精神文明之壹種表徵，而現時之廣州呢，則可說是面目惡劣，全無美感的。

古榕樹，在南方草木中，極饒風致，從前羊城最多，街頭壹株兩株，枝條疏密，老幹枒株，人家掩映於其間，頗可以入籬，但而今廣州市裏頭，榕樹已經絕跡，（祇有沙面尚有幾株），這就象徵廣州已經失掉了壹件很雅尚的外服。從前之寶漢茶寮，以黃鷄白酒，菜心炒粉著名，其地則竹床木桌，毫無陳設，而自然有一種田家風味，坐來覺得舒服，而現在呢，黃雞白酒雖尚不失為傳統之菜式，而風味已大不如前，至於菜心炒粉，則視為窮措大之物，買首買醬，叫來句飽等不區區留，稱之而起者，則炒麵也，炒飯也，爛雞翅也，海鮮也。

時款菜式也，其陳設則廳也，房也，時款傢私也，電風扇也，蘇雀牌也，凡小北越秀一帶之酒家，每逢假日及星期日，則人影幢幢，喧嘩嘈雜，蘇雀牌之聲，迫卜不停，直騰五層樓（鎮海樓）而上，蓋其趣味，已非復舊時，而漸趨於低級矣。至於財政廳前，由惠愛路口，永漢路北，至太平南路，西濠口一帶，其嘈鬧喧囂，尤足使人頭痛，（最近都市之進步，已由顏色之統制，進於聲音之統制，凡惡劣不美之景色，碍於視覺者，固然禁制，即惡劣嘈鬧之聲音，碍於聽覺者，亦加以禁制，一以保持市容之優美，一以維護市民之健康。在十年以前，日內瓦，柏林，紐西蘭等地，已頒布警律，限制汽車之鳴號，不得過頻，不得過響）。從前之廣州，本有一種極可愛之地方風味，觀於前人之詩文筆記，聆之於父老之口述即知，即在清末民初，此種風味亦可以領略得到，而現在之廣州，乃為一絕無審美性之嘈雜市場，以吾足跡所經，遠之如西歐南歐中歐各國，次之如東歐巴爾幹半島諸邦，又次之如日本台灣越南馬來緬甸，近之如燕魯秦晉荆楚吳越諸省，每一個名城，總能保持其一部份之地方風味，惟現時之廣州，則消失無餘，可知其變化之急激。平常人說，一個都市太嘈亂，住下去可以使人生病，我則有壹個感覺，在廣州住下去，不特可以生病，而且可以犯罪！由此亦可見廣州（自然亦是廣東）已急激轉變，入於壹個新的經濟文化階段，此即吾人之所謂捐商賭棍之經濟文化階段是也。在這個階段裏頭，不特傳統的舊文化消失無餘，連洋商文化亦不能立足

，觀于年來西關之衰落，西關大家之相繼破產即知。

洋商文化何以會沒落呢？第壹，自然是因爲第壹次歐洲大戰的影響，這場歐戰，足足打了四年，打完了之後，經過好幾年，原氣還不能恢復，恢復了沒有好久，世界不景氣又來，從前洋務商人那種黃金時代的做生意機會，已經一去而永不復返，（反之，日本因爲工業發達，便乘這個機會，而大獲其漁人之利）。第二，這是最緊要的，是因爲自民二以後，連年戰爭，百業凋殘，以至社會不安，盜風四起，最後則農村亦隨之而破產。比如順德的生絲，一方面關係本省的產業，一方面關係對外的貿易，故爲全省經濟命脈之所繫，然自順德絲業一落千丈，則無論洋商土商，工農各業，都無不交受其影響。此爲洋商沒落，捐商崛起之一個大關鍵。捐商一旦崛起而構成一個階級，樹立了一種勢力，其勢力便反過來，轉而侵入政治社會裏面。社會上未必一切都屬捐賄，但各方面於不知不覺中，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捐賄勢力的影響，而染到了一些捐賄的氣味。在政治是如此，在社會是如此，在教育、學術、文化、醫藥、宗教、各方面，都莫不如此。我們隨便跑到甚麼地方，都可以見到一副捐賄的面目，捐賄之所以成爲文化，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在這裏隨便插入一段枝節，有一個學生問一個先生，去外國讀書怎麼樣，先生說，我從前在外國留學，花了許多錢，現在回來教幾點鐘書，還得不到八厘息，去來幹甚麼？還是做生意好！這很可以代表捐賄文化的思想。所

以，把烟賭與包捐制度取消，大約不難，但如果要把捐賭文化的影響，的習染，一概剷除淨盡，則恐怕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問題之所以嚴重，即在於此。

從前洋商文化形成，其勢已咄咄迫人，但因舊文化之流風餘韻，尙未完全泯滅，足以砥柱一下，故社會人心，尙不至十分大壞，後來捐賭文化形成，舊學之流風已熄，而新學又淺薄到極，毫無根芽，不足以砥柱人心，於是人心起了動搖，社會之壞，即由於此。

廣東本來多錢，而歷史傳說中，又有一個貪泉，據說，吳隱之（東晉時廣州刺史，都督交廣二州軍事）來廣州，曾酌貪泉而賦詩，後來廣東與諸省通商，無非爲錢，洋商之崛起，也是爲錢，捐商賭商，承着這種深厚的遺澤，自可不言而喻，所以捐商賭棍的文化，有一個中心信仰，這是極端的拜金主義，錢是最好，錢是最親，錢是最有用，錢是最可貴，最寶貝。由是生出一種人生觀，單純的搵錢，積極的搵錢，絕對的搵錢，拚命的搵錢！此種思想，深深的打入政治與社會裏頭，我們所見到社會上的一切，都無非此種思想的反映，所以廣東人最充實的是銅氣，而最缺少的是書味。

現時廣東的民風，可說是腐化到極，墮落到極，一般人祇有講勢力，講金錢，不復措意甚麼叫做道德禮義，一旦社會無道德無禮義爲之砥柱，這個社會便非崩潰不可。道德禮義，雖然是一種極抽象之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但社會人羣，綱紀秩序，所賴以維持不墜者

，即是此物，一旦此物不存，則人將相食矣。我們試想想，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城之後，粵人屢次被征服，做順民，其故果安在？在而今文明綫中斷之中，（這是我們在「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一書裏頭所用的一種說法），舊者已去，而新者未來，其社會病態之表現，在別省為貧血，為衰萎，而在廣東則為惡疾，為中毒，（至於上海，則又比廣東更甚十倍）。現階段的所謂廣東文化（文化兩個字，一路用來，都有點滑稽，有點開玩笑），我們所見到的，大概就是這樣。

## 第六章 嶺南文化之前瞻

所以，如何把這個文化的暗流遏下去，讓主流重見天日，暢行無阻，這就是廣東當前之一個最重大的問題。能夠如此，這便是嶺南文化之復興，亦即文化之再生。同時亦即一種新文化之創造。而今我們要回頭講一講，這個暗流，何以會這樣的氾濫起來，而把主流壅塞了呢？這完全是由近百年的歷史所造成。而所謂歷史，又有大部份繫於「士人」一個階級。中國往昔的政治，雖然極端專制，生殺予奪，完全操之於君主一人之手。這種政治當然是壞到極，但其中却有一點好處，（這不是政治的好處，而是教化的好處），則政治的責任，完全付之於士人之手。士人束髮受書，熟習古昔聖賢之嘉言懿行，一旦負起實際的政治責任，便不期然而然的，會把從前讀過的書（即所謂古昔聖賢之嘉言懿行），來造施政的方針，這是士人從政的一種精神背景，亦是士人所有的一種最高的政治理想。雖然每個士人都未必能夠這樣賢明，而且在過去的士人中，着實有不少酷吏或者貪贖的事，但無論如何，他們對於賢愚忠佞，是非黑白，總有一個分曉。所以心雖盜跖，而口必聖賢，如果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倒行逆施，則必爲清議所誅，不能容於士人社會。這個所謂清議，就是政治社會裏頭之一個保險制，一服防腐劑，同時亦是現時社會學所講的一種最有效的社會制裁的力量，保

証這種政治理想，政治標準，使他永存不墜。其時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國家，生活簡單，民風儉樸，這種政治理想，但能實施起來，即無有不齊，無有不奏效。那些高高在上的君主不必一定要很賢明，但能夠不太昏聩，加以防範，這種政治，自然能夠推行順遂，所以，過去中國的政治，完全繫之於士人，士人對於國家社會，大概負有三重責任，一是政治的，二是學術的，三是道德風化的，三者相連，可說是一種三位一體的責任制。這三種責任，可以拿三個字來解釋，第一個是學之用，第二個是學之體，第三個是學之質，（即其最高之精神）。學問之體當然是學術，其質則為道德，其用則為政治。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質，其次為體，又其次為用。有其體，有其質，而無其用者，當然還是士人，有其用，而無其體，無其質者，則無論如何，根本不能稱為士人，至於有其體，有其用，而無其質者，此則為士人之敗類。中國過去那種士人政治，是為政治設之於教化之下，以教化指導政治。一路從歷史初期，以至滿清中葉，都是這樣，（其不是這樣者，天下便大亂，唐五代，東漢末年，宋明二百餘載，都是最好的例証）。

但後來不然了，海禁一開，通商發達，廣東首當其衝，社會與經濟，即大受其影響，到了洋商文化樹立，中國傳統的舊文化，即隨之而崩，傳統文化一崩，士人階級亦即隨之而沒落。而今那些讀書人，根本即不是讀從前那些書，同時社會與經濟之環境，已經變遷，即使

專讀從前那些書，亦無法可以應付。又一方面，則現時之所謂讀書人，都無非稗販一些很膚淺的外國知識，對於西洋社會精神文明之背景，能夠深切了解者，有如鳳毛麟角，實在不能稱爲士人（以從前士人之意義言之）。又一般之從政者，已由士人而一變爲政客，更不能稱爲士人（亦以從前士人之意義言之）。故無法可以擔負從前士人所應負而能負的那些責任——政治，學術，道德，風化。卽學之體，質，用，並行不背。這是中國一個普遍的整個的問題，不過在廣東則影響更深，感覺更爲尖銳。這是因爲士人階級之消失，而使政治與教化，失了良匠，失了舵工之一個大關鍵。

其次，就政治本身來講，從前的政治，無論爲良爲惡，必然有一個秩序，有一個綱紀，這是政治運行的一條軌道，絲毫不能紊亂。民國肇建，政體更新，我們已經換過了一個新的秩序，這是從甲午庚子以後一般人所夢寐以求之一個境界。所以在民國元二年間，全國都有一種新氣象，而廣州則表露得更爲鮮明，過去四十年，廣東的政治，就是以這兩年爲最清明，最廉潔，可惜這種良辰美景，僅如曇花一現，自民二以後，廣東局面，便始終在一種擾攘不定的狀態中，迭被龍濟光莫榮新等所盤據，時時都盤旋在一種軍事狀態，或半軍事狀態之中，一切秩序，都爲之擾亂，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當然談不到甚麼綱紀，縱有從前的士人階級，亦無法可以維繫，何況其時已無士人，而祇有政客？因爲軍事之故，政治第一件事當然

是籌餉，籌餉第一件事當然是開賭（自前清張鳴岐禁賭之後，廣東於民國六年第一次重復開賭）。第二件事當然是加重捐稅，對捐商與捐務，大開其方便之門。因此，捐商一轉而入於一個飛黃騰達之時期，而捐商賭棍之文化，即由此而樹立。

由此可知，捐賭文化這個暗流所以氾濫起來，完全是由於士人階級之消失，與後來政治之不安，軍事之擾攘而起。過去的士人階級，已如千年黃鶴，一去而不復返，此時欲重新建立一個士人階級，已如寒灰吹燼，其勢有不可能，因為政治社會經濟種種情形，經已變遷，無從建起，即使勉強建得起，亦不免有南轅北轍之概，何況所謂士人階級，（照從前之意義言之）。是一種精神的與社會的產物，並非如一間工廠，一副機器，要建就建，咄嗟可以立辦。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此刻簡直可以不必討論，不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能夠生存，完全依賴於其文化之營養，因此，我們對於士人一個問題，雖然可以撇開不談，但對於文化這個問題，則無論如何，不能撇開不談，因為祇有文化發臭，然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方能得生存，才能夠進步。所以，如果能把捐賭文化這個暗流遏下去，把他堵塞着，惟有復興嶺南的文化，使嶺南文化的主流，沛然運行，一旦這個文化的主流，沛然運行，這便是嶺南文化之再生，亦即嶺南新文化之產出，同時在政治方面，政治亦自然可以歸於安定，歸於清明，政治的綱紀，亦自然可以樹立，這個文化的暗流，自然可以遏下去。

所謂嶺南新文化者，不必求之於外，祇須求之於嶺南本身，求之於其過去歷史之使命，求之於其地理之因素，求之於其民族之特性，求之於其經濟之環境，從而配合中國文化之進展，滙合世界文化之潮流，如此即可以構成今後嶺南之新文化。我國須要記得，嶺南文化之主流，最初是起於孤臣謫宦之遺民文化，中間經過幾百年理學文化之陶冶，再加以近百年來世界潮流之激盪，孕育而為革命的文化。我們重興嶺南，重振嶺南之民族，一定要復興這種革命的文化。革命文化之源泉是赤血與赤心，有之則生，無之則殆，過去幾年抗戰，我們已經灑了無限的鮮血，擲了無數的頭顱，從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戰役，燃起了抗戰的火燄以來，粵人無時不欲得敵人而甘心，無時不欲灑其鮮血，擲其頭顱，以雪祖國之恥辱。經過這幾年抗戰，粵人無論在那一條戰綫，都打得有聲有色，都立過奇勛，如此，便接上了革命文化的主流，使主流沛然暢運。所以，這回抗戰，應該是嶺南文化復興之一個大關頭，我們應該緊緊握住這個關頭，以促嶺南新文化之產出。

民族之復興與文化之發揚，有兩個主要的條件，一為其精神的背境，一為其物質的背境，一關乎他的歷史的遺傳，一關乎他的地理的因素。嶺南民族，其歷史如何，民性如何，過去五六百年間之學術思想如何，最近百年間所崛起之地位如何，我們在上頭已經大致講過，從這幾點看來，嶺南在歷史上之遺傳，可說是豐富到極，質言之，即其精神背境，充沛到極

，當然有可以復興之道，至其物質條件如何呢？我們可以從他的地理環境裏頭，看出一個大概。

嶺南位于東亞大陸之前門，東面太平洋，接近呂宋琉球，由此而通夏威夷美利堅，南通越南暹羅，接連馬來半島，爪哇，蘇門答臘，西通印度波斯，紅海歐洲，南達婆羅洲，新西蘭，澳大利亞，這個位置，就是做成他掌握海外商業交通，移民全球各地之一個理由，這一塊地居於北緯十八度至廿五度之間，北回歸綫由潮州汕頭而經過廣州蒼梧，有一半屬於熱帶氣候，終年雨量豐沛，故物產豐饒，果木繁茂。他的海岸綫在全國各省中為最長，所以擅山海之勝，富魚鹽之利，粵鹽之品質與產量，足與兩淮長蘆相伯仲。全國有好幾條偉大的河流，每條河流總分配好幾省，而廣東則獨占珠江，其支流東西北三江之流匯而注於南海，看來儼如一把扇形，故灌溉得宜，土地肥沃。除了珠江之外，還有一條韓江，還有沿海的地區，所以珠江三角洲，韓江三角洲，雷州半島，都是很肥沃的魚米之地，除了魚米之外，順德一縣，還出產大量的蠶絲，足與江浙的蠶絲齊驅並駕，至於海南島之屬於熱帶性，其物產之豐饒，更不必說。

不講旁的，祇講果木。廣東的鮮果，如荔枝，香蕉，菠蘿，甘蔗，新會甜橙，潮州蜜柑，已經不僅馳名於中國，而且馳名於世界，美國最佳之鮮橙，最初得種移植，不外兩條來路

，一廣東，一西班牙，而西班牙華倫西亞Valencia之橙種則出自廣東。香蕉一物，西洋人視爲無上珍品，地位超出其他果品之上，遠在一九一四年，香蕉輸入美國，已經值一千六百萬美元，大都來自西印度，然遠不及廣東香蕉之芳香甘美。至於波羅，雖爲熱帶各地所盛產，然遠不及廣東所產者之甘香。廣東而能夠產出這些東西，都是因爲他的地土與氣候之故，（嶺江三角洲與韓江三角洲大致爲半熱帶氣候，而海南島則爲純熱帶氣候）。氣候這個條件，關係真是太大，現時海南島已經盛產熱帶植物，如椰子、棕櫚、樹膠、烟草、香料、藤木、品質均極佳，（以滿清末年至民國初年專門經營瓊崖實業之僑豐公司僑興公司之經驗言之），將來還可以移植或大量推量其他的熱帶植物，如咖啡、谷哥、金雞納、玉桂、樟腦、荳蔻、乳香、沒藥、香草Vanilla之類、其前途當爲台灣一島所望塵不及，（而過去日本之興起，便有一大部份靠着台灣的物產）。所以，如果東北四省是中國經濟命脈之所在，則瓊崖一島便是廣東經濟命脈之所在，（還有東沙島與西沙，南沙，圍沙羣島，亦應與瓊崖島同一看法）。

祇蔗糖一項，如果發展起來，在中國經濟上，便是無窮之利。樹膠亦然，烟草亦然，椰子亦然。現時印度、爪哇、台灣、西印度、所產之蔗糖，馬來半島與爪哇所產之樹膠，美國、土耳其、巴西、小呂宋、所產之烟草，已經佔據了世界的市場。至於椰子一樣東西，其用

途近年已經愈推愈廣，其肉可食，其油可食，而且富於滋養，故椰子油在食料上已經可作牛乳牛油之代用品。至於在工業原料上，椰子之用途尤廣，現時世界各國對於椰子之需要，繼長增高，除椰子之外，其他之植物乳油，即產生油脂之熱帶植物，在食料上及工業原料上，均占極重要之位置。目前世界上唯一可以抽取大量原料的地方就是熱帶，熱帶之征服，已成世界政治經濟問題中之一個極迫切的問題，而廣東地域有一半屬於熱帶，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不必講到咖啡谷哥金雞納之移植，（如果能夠移植，而又能夠發展，則可以分巴西咖啡，非洲谷哥，爪哇金雞納，在世界市場上之一杯羹），我們如果能夠把樟腦之栽植，大量推廣，把樟腦業大量發展，便可以推倒台灣樟腦在世界市場上之地位。還有合浦一帶，自漢以來，盛產明珠，而今日本對於蓄蚌採珍珠之事業，有相當的成功，我們能不能在廉州雷州一帶，廣闢池塘，從事養蚌，恢復前南海明珠之盛譽，真個使「合浦珠還」呢？

中國蠶桑事業，以太湖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兩個地方為最發達。順德生絲，品質之優美，不下於江浙，因為氣候溫暖，每年蠶桑可以有八造之收成，從前順德絲業旺盛，生絲出口，每年值港幣一萬萬元，占全省輸出指數之第一位，而今雖然一落千丈，但並非不能復興。至於米食，在廣東向來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每年約短少一千萬担），然據友人王君敬止之專

辦到。查三角洲之沙田，由珠江冲刷泥滓，積聚而成，全面形成扇狀，其面積約爲三萬頃，計東莞番禺各三千頃，寶安順德各二千頃，中山一萬八千頃，新會千餘頃，台山數百頃，地勢平衍，每日潮水漲落各二次，得天然之利，而無水旱之患，土質爲河流冲積土，深厚肥沃，故成膏腴之區，然因租佃制度之不良，（租地既無年期，又無租約），中間階級如包田者分耕者之剝削，沙伏與引耕者之侵噬，稅捐之繁重，與夫業主之祇知收租享樂，而一切閉目不理，故農民（多數爲蛋民）生活苦極，架茅爲居，隨時流動，既無村落，又無屋宇，一如上古時代之游牧社會，與現時各地之農村社會，完全兩樣。因其流動，而尙未形成固定的村落，故祇能從事一種流動的耕作，耕法萬分粗陋，春季犁耙之後，每隔二尺餘爲一行，先種早禾，其後約經二十餘日，再於行間種晚禾，（此法俗稱種揸藁），既不施肥，又不耕耘，以待收穫。一地耕完，即棄之而之別地，對於地土，毫不愛惜，損耗地力，莫此爲甚。所以雖有早晚造之分，而兩造同種一地，實則祇等於一造，故每畝每年收穫，祇得三四担。以如此膏腴，而得此收穫，實可悲憫，同時以如此粗劣之耕作，而能得此收穫，亦可見其地土之肥沃。而今改良之法，惟有改善租佃制度，改善農民生活，使其聚成村落，由流動耕而變爲固定耕，將原來之二造同種一地，（即種揸藁），改爲二造分造種植（俗稱種翻藁），於春

季耕犁之後，築基蓄水，（沙田向無田基），先種早造并施肥耕耘，俟早造收穫，再為施肥耕耘，然後再種晚造，如是，則原為一造之沙田，立可增為二造，而產量可以不止增加一倍，以每畝每年增穀四担計之，合三萬頃，則每年可增穀一千二百萬担，可相等於粵省每年所短少之米石，此法極簡單，極易行，除解決粵省糧食問題之外，還可以移民五六十萬人，建設一理想之新村，實施管教養衛之試驗。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塊地方，因為他可耕的面積，可以媲美於從前歐洲的丹麥，而土壤則不知比當時的丹麥肥沃幾多倍。現時丹麥已經以其農村教育，以其農村組織，以其所出產之雞蛋、牛油、乳酪、家畜、蔬菜、及其他一切農產品，雄視全球，我們珠江三角洲，（還有韓江三角洲）的沙田，將來怎麼樣呢？

我們還沒有講到其他種種的物產，如果一併拿來研究，則嶺南儘可以稱得起一個天府之國。而今撇開農產品不談，而轉談工商業，則廣東的前途，更為遠大。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實業計劃裏頭，已經擬定發展廣州，使之成為中國南方之世界大港，同時創立造船廠，改良廣州之水路系統，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將來這個計劃完成，則廣東的地位，更加要比現時重要十倍。廣東這個地方，從人力、物力、財力來說，都有相當的力量，而且力量相當的雄厚，這種力量，除了本省所能產生者之外，還應該加入一部外面的力量——華僑的力量，分散於全世界各地，而匯歸於廣東、我國華僑，其數約為一千二百萬

人，散居於全球各地，除南洋羣島有一部份爲閩僑之外，其餘差不多盡是粵人，分佈極廣，凡日本、朝鮮、呂宋、越南、馬來、緬甸、印度、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澳洲、新金山、雪梨、紐絲蘭、北美洲、加拿大、美洲合衆國、古巴、墨西哥、南美洲、秘魯、智利、巴西、歐洲英法荷蘭諸邦、非洲毛里斯、馬達加斯加、南非洲好望角各地，無不有粵人之足跡，一日二十四時，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之社會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足與大英帝國永無落日之說，並傳爲美談，所以廣東名則爲一省，而其實則不止一省（以力量而言），而華僑所代表的力量，又是一種新鮮的，活潑的，少壯的，海洋的力量，與國內人民那穩老大的，傳統的，貴族的，內陸的力量，有很大的不同，而今海外的華僑已經不斷的以他們那種新鮮活潑的力量，傳送回來，將來那兩種力量——新鮮的與傳統的，海洋的與內陸的——一旦調和起來，又必然可以產出一種更新的力量，這在生物社會學上，是可以看到的。

我們認爲將來廣東文化之發展，有大部份是朝着經濟路線上行，廣東這個地方，從他的地土、氣候、交通、物產、人力來說，天然是一個經濟區域，這個地方，雖然不能爲意大利之羅馬，但儘可以爲意大利之米蘭。雖然不能爲德國之海台堡，之耶拿，但儘可以爲德國之萊比瑟。雖然不能爲英國之牛津，之劍橋，但未嘗不可以爲美國之紐約，之三藩市。在而今

社會演變中，經濟條件，愈趨愈重要，（蘇聯建國，必先以經濟建設，美國所以能為世界民治主義之保衛者，即以其經濟條件之優越，）將來廣東文化之發展，對於中國文化之前途，必有一種很大的貢獻。

不過，而今要回過頭來，反省一下。粵人向來自負，（而人亦以此許之），有一種企業的工商本領，（因為自六朝以來，即與諸蕃通商，而最近之一百年，又執海外貿易之牛耳），但現時不行了。廣東在現時的工商業界裏頭，已成為一個落後的省份，無論甚麼事，都覺退化。從前粵人在天津漢口上海各地之商業，占極重要之位置，但而今已江河日下，尤以漢口為尤甚。當時粵人在華北各省長江各地之活動，（如交通，建設，商業，金融，）無非憑藉着唐景星，梁如浩，陳超常，唐紹儀，梁士詒諸人之地位而起，一旦諸人不在，便無人繼起。從前廣生行之化粧品，在京津滬漢各地，極盛一時，這是因為得風氣之先，無人與之競爭之故，但而今已經一落千丈，祇餘片鱗殘甲。至於陳李濟，黃祥華，梁財信之藥物，（從前極流行於各省，）更不必說。一間中國輪船公司（有兩隻船，走美洲航綫），一間金星人壽保險公司，一間廣東銀行，一間南洋烟草公司，一間馬玉山糖果餅干公司，當其開始之時，（在上海）聲勢赫然，幾於路人側目，然不滿二十年，即一一相繼破產，（至於先施，永安等百貨公司則可以視為僅存之碩果），這很可以象徵粵人那種華而不實的神氣，所以有人

稱廣東人爲「大光燈」，爲「荷喇水罇」者。因爲粵人一味浮誇，華而不實，所以現時事事感覺落後，事事不能與人競爭，現時粵人在全國金融界與工商業界，並不占有位置，試把全國各行各業，逐項觀察即知。在一般新興的工業製品來說，廣東大概都不如人，其尤甚者，則有些事業，在本省都不能立足，不得不拱手以退讓賢者，觀於民廿五年以後，海上各家銀行在廣州之相繼興起，本省銀業界之蕭條枯窘即知。廣東至此，已失去從前那種先進的領導的地位，而退居一個附從的地位，甚至至一個被支配的地位了。

經濟活動，可以說就是廣東的血脈，亦即廣東文化之一個生存的要素，而今一旦退縮，這是廣東文化之一個很大的危機，如果不加以挽救，前途實在不堪設想。不過，如何挽救呢？靠誰來挽救呢？我們以爲這個責任，一半在人民身上，一半在政治身上，而政治則尤爲重要，關係尤大，言政治則人民亦在其中，所以，我們此刻拋開人民而談政治。

我們以爲挽救廣東經濟的頹勢，推進經濟的活動，使廣東經濟，回復在三千年前之盛大光明，在積極方面，在大規模的建設方面，政府當局，及一般專家，已經有很好的很周詳的計劃，用不着我們置一辭，至於在消極方面而言，我們極懇切的希望今後的當局，對於私人企業的活動，勿加以任何不必要的掣肘，或者對於企業本身有防碍的縛束。粵人在企業上的活動能力，本來很強，平時不必加以任何督促，任何的推動，他自身已經可以發展。他最需

要的，不是推動，不是牽挽，而是在發展之時，無人加以阻撓，加以防碍。如果能夠不加以阻撓，不加以阻碍，使能夠自由發展，這就等於給他一種很大的幫助。過去各地的華僑，對於祖國，差不多望而生畏，不敢回國投資，經營實業，恐怕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原故。我們以為從前西歐經濟學者所倡導那種經濟的放任政策 *Laissez Faire Poieice*，在中國很用得着，尤其在廣東，更用得着，因為我們現時的社會經濟情形，和西歐那個時候的社會經濟情形，有很多相同之處。

當然在抗戰期間，在軍事期間，在政局不安定的期間，一切都要歸國家的統制，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不過這種統制，一定要絕對的公平，官民一體，不能有私毫的例外。能夠如此，則人民無不歡迎統制，因為這種統制，是絕對的必要的。同時，如果產業發達，某一種企業，某一個階級，某一部份人的利益，已經超出其所應得之標準，或者與國家或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衝突，則國家亦非加以統制不可。這種統制是絕對的必要的，現代社會政策之成功，將來社會主義之實行，即以此為其嚆矢，我們在民生主義裏頭，已經讀到很多這種理論。

而今我們要認清楚放任與統制這兩件事，其間應該有如何的分別。大約放任所以處常，統制所以處變，所謂常與變，平時為常，非常為變，普通的常，局部的為變，一般的情形為常，特殊的情形為變。放任所以助長產業之繁榮，應該施之於產業衰落之時，統制所以節制

資本之不均，阻止利益之衝突，應該施之於產業發達之後。如果我們能夠從這一常一變，一先一後，來斟酌取舍，則放任與統制之意義，即可以得之矣。

而今我們還要講一講，過去廣東產業所以衰落，大半誤於種種之阻碍，種種之縛束，（而今還要分清楚，縛束與統制，絕對不同，統制是有意義的，有理性的，縛束則絕無意義，絕無理性），而公家又好談建設，而建設又不以其道，自有馮銳辦糖廠這種建設以來，廣東建設事業之前途，即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其影響於當時者尙小，惟影響於後來者則無窮，而今其事已過，但我們還要鄭重的把他提出來，以作後人之殷鑒。大約一個國家的建設，其目的在人民呢？抑或在謀利呢？當然不是在謀利。所以公家做事，萬不能與民爭利。蓋「藏富于民」，古有明訓，「百姓足，君孰與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這句話，應該拿來做我們經濟建國之一個原則。

如果經濟活動是廣東的血脈，則精神活動——民氣——便是廣東的靈魂。嶺南向來民性剛強，民氣煥發，用不着我們細說，不過其中有一點頗值得我們注意，即此種民氣，亦如廣東的工商業一樣，經過若干年，頗為消沈，其中最大的關鍵，當然是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失敗。我們還記得，民四以後，從海外歸來，粵垣已經另有一種景象，人民已經一轉而入于敲經念佛這條路上，再加以以捐賭氛圍之侵襲，以後愈來愈消極，則沉緬于麻雀烟賭飲食之中

，如此苟且偷生，時時都感到無聊，到處都呈現出一種沈倦的狀態，除非有時碰到一兩回意外的非常的刺激，如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事件，然後可以起一種反應，振奮一下。粵人至是已經消失了一大部份從前那種積極的開創的民氣，祇餘一種消極的被動的民氣，比之民元二年，或者滿清末年那種意氣飛揚的景象，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計，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民氣與民德一樣，是一種頂抽象的東西，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但一個民族之能夠生存，能夠昂頭立足于天壤之間，便完全靠着這件東西，爲之支持撐柱。這件東西又最脆薄，最難長成，（凡愈寶貴的東西，愈是如此。蔓草可以隨地亂生，而幽蘭則必加以培養，加以維護），所以，往往數十年培養之不足，一朝破壞之而有餘，我們希望今後的政治，對於這一點很脆薄的東西，在積極一方面，極力加以培養，加以維護，消極一方面，勿加以遏抑，勿加以摧殘，因爲他關係嶺南文化的精神，我們語重心長，縱有萬語千言，都說之不盡。

還有士氣（士人的氣節），卽士風，此層亦極關重要。嶺南文化之復興，不用說有大部份要政治負責，不過除了政治之外，我們還希望有一個士人的重心出來，替政治分担一部份的責任，以作政治之輔翼。這個重心，就是社會重心，這個重心從前是有的，不過後來消失上，我們總希望將來有復活之一日。

過去中國士人社會所負的那三種責任，——政治的、學術的、道德風化的——我們已經講過了。這個士人階級，就是從前的社會重心。自從這個重心消失，中國的政治社會，即呈一種江河日下之勢，我們現時並不希望重建一個新的士人階級，負起政治的責任，（如其這樣，那就等于從前的政學系），但我們却馨香禱祝有些超邁的人出來，抱道自持，以風化自任，至少亦以學術自任，一矯現時廣東那種社會風氣。曾滌生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我們要記得，我們是陳白沙的後輩，白沙以曠世之才，入聖賢之域，開有明一代理學，生平淡聲華而薄榮利，凡出其門者，多能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激而為士風，其間五百年，為嶺南學者之所宗仰，流風餘韻，至乾嘉以後而猶未息滅，全國學者，無不奉之為道德學術界之泰斗，我們而今，忍見白沙故鄉，白沙後輩，為捐賂文化所蹂躪，所踐踏麼？忍見一千年來，嶺南之聲名文物，如此墮落麼？

如何在這個苦熱場中，來一服清涼散，灑幾點楊枝甘露，此則有賴乎抱道之士，以風化自持，以廉潔自守，形成一個重心（即所謂 *olive* 者是），一旦這個重心形成，則士風可以由此養成，民德可以由此激勵，即清議亦可由此產出矣。

這兩種活動，一精神的，一物質的，即經濟的，就是廣東的兩件寶貝，亦即廣東文化之生存的要素，一個是廣東的靈魂，一個是廣東的血脈，無論如何，都應該加以維護，加以培

養，使其發達，使其繁榮。我們回顧嶺南歷史文化之遺傳，回顧其地理條件所做成之種種物產，知道廣東無論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之背景，都非常豐富，非常深厚，應該可以蔚為一個光華燦爛的世界，所以嶺南文化可決其必然復興。嶺南文化之復興，不必求之於外，祇須求之於嶺南本身，求之於其過去歷史之使命，求之於其地理之因素，求之於其民族之特性，求之於其經濟之環境，從而配合中國文化之進展，滙合世界文化之潮流，如此，即可以構成嶺南今後之新文化。我們須要記得，嶺南文化之主流，最初是起於孤臣謫宦之遺民文化，中間經過幾百年理學文化之陶冶，再加以近百年來世界文化潮流之激盪，孕育而為革命的文化。我們要重興嶺南，一定要復興這種革命的文化。

這幾年的抗戰，我們已經灑了無量的鮮血，擲了無數的頭顱，而重新接上了嶺南文化之主流，這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們曾經講過，革命文化之源泉是赤血與赤心，血是最鮮明的，最熱烈的，心是最慈悲的，最真摯的。祇有這兩件東西，可以把人問一切罪惡，一切愚昧，一切魑魅魍魎，一切自私，自利，卑鄙，污濁，黑暗之舉，一概洗除，使人人返乎天真，返乎赤誠，舍此更無他道。鮮血是最可寶貴的，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之血，熊飛伍隆起之血，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之血，馮夏威史堅如之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血，淞滬十九路軍將士之血，與此次抗戰死難諸將士之血，豈不是一樣的血麼？赤心又是最可寶貴的，這許多

人的血，豈不是都從這許多人的心流出來的麼？既然有這顆心，流這些血，嶺南文化可以復活了，嶺南新文化可以產出了。

嶺南居山海之間，乘炎品之氣，山則有雲嶺羅浮，水則有珠江南海，潛則有蛟蟲，動則有虎豹，木則有紅棉，果則有丹荔，花則有素馨茉莉，香則有伽楠沈水，珍寶則有翡翠珍珠珊瑚玳瑁，故其人物則有佗王之豪雄，六祖之智慧，熊飛之慨慷，陳秋濤（子壯）陳巖野（邦彥）之氣節，陳白沙湛甘泉之純粹，屈翁山陳元孝之孤潔，張曲江（九齡）崔清獻（與之）之忠蓋，李忠簡（昂英）海忠介（瑞）之耿介，南園前後五子之風流文采，洪秀全孫中山之革命精神。我們要復興嶺南文化，是復興這些東西，這是嶺南民族精神與生命之所寄托。

如是，嶺南人物應該有一種風格。他應該以羅浮之登拔爲其精神，以梅嶺之高寒爲其品格，以珠江之晴朗爲其風度，以南海之清瀚爲其襟懷。能如是，誠不愧爲佗王之子孫，紅棉丹荔之人物矣。

「寰宇記」載，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騎五色羊，來集楚庭，各手穀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曰：「窮此國爾，永無荒饑。」言畢騰空去，羊化爲石，城遂以名。我作此言，亦欲衣一色衣，騎一色羊，手持穀穗，一莖六出，習與嶺南人士，以祝嶺南新文化

嶺商民性與嶺南文化

之誕生，之開花結實。

八八

东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民族文化叢書  
學術叢書第三種

#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實價國幣壹元

著者：黃尊生

出版者：民族文化出版社

曲江抗日西路三號

印刷者：國民印刷所

地址：河西三段大中工廠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養，使其發達，使其繁榮。我們回顧嶺南歷史文化之遺傳，回顧其地理條件所做成之種種物產，知道廣東無論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之背景，都非常豐富，非常深厚，應該可以蔚為一個光華燦爛的世界，所以嶺南文化可決其必然復興。嶺南文化之復興，不必求之於外，祇須求之於嶺南本身，求之於其過去歷史之使命，求之於其地理之因素，求之於其民族之特性，求之於其經濟之環境，從而配合中國文化之進展，滙合世界文化之潮流，如此，即可以構成嶺南今後之新文化。我們須要記得，嶺南文化之主流，最初是起於孤臣謫宦之遺民文化，中間經過幾百年理學文化之陶冶，再加以近百年來世界文化潮流之激盪，孕育而為革命的文化。我們要重興嶺南，一定要復興這種革命的文化。

這幾年的抗戰，我們已經灑了無量的鮮血，擲了無數的頭顱，而重新接上了嶺南文化之主流，這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們曾經講過，革命文化之源泉是赤血與赤心，血是最鮮明的，最熱烈的，心是最慈悲的，最真摯的。祇有這兩件東西，可以把人問一切罪惡，一切愚昧，一切魑魅魍魎，一切自私，自利，卑鄙，污濁，黑暗之舉，一概洗除，使人人返乎天真，返乎赤誠，舍此更無他道。鮮血是最可寶貴的，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之血，熊飛伍隆起之血，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之血，馮夏威史堅如之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血，淞滬十九路軍將士之血，與此次抗戰死難諸將士之血，豈不是一樣的血麼？赤心又是最可寶貴的，這許多

人的血，豈不是都從這許多人的心流出來的麼？既然有這顆心，流這些血，嶺南文化可以復活了，嶺南新文化可以產出了。

嶺南居山海之間，乘炎品之氣，山則有雲嶺羅浮，水則有珠江南海，潛則有蛟蟲，動則有虎豹，木則有紅棉，果則有丹荔，花則有素馨茉莉，香則有伽楠沈水，珍寶則有翡翠珍珠珊瑚玳瑁，故其人物則有佗王之豪雄，六祖之智慧，熊飛之慨慷，陳秋濤（子壯）陳巖野（邦彥）之氣節，陳白沙湛甘泉之純粹，屈翁山陳元孝之孤潔，張曲江（九齡）崔清獻（與之）之忠蓋，李忠簡（昂英）海忠介（瑞）之耿介，南園前後五子之風流文采，洪秀全孫中山之革命精神。我們要復興嶺南文化，是復興這些東西，這是嶺南民族精神與生命之所寄托。

如是，嶺南人物應該有一種風格。他應該以羅浮之登拔爲其精神，以梅嶺之高寒爲其品格，以珠江之晴朗爲其風度，以南海之清瀚爲其襟懷。能如是，誠不愧爲佗王之子孫，紅棉丹荔之人物矣。

「寰宇記」載，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騎五色羊，來集楚庭，各手穀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曰：「窮此國爾，永無荒饑。」言畢騰空去，羊化爲石，城遂以名。我作此言，亦欲衣一色衣，騎一色羊，手持穀穗，一莖六出，習與嶺南人士，以祝嶺南新文化

嶺商民性與嶺南文化

之誕生，之開花結實。

八八

东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民族文化叢書  
學術叢書第三種

# 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實價國幣壹元

著者：黃尊生

出版者：民族文化出版社

曲江抗日西路三號

印刷者：國民印刷所

地址：河西三段大中工廠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